

---

---

# 羅馬到波斯——絲路西段的宗教 圖書館初探<sup>\*</sup>

王翔

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北師港浸大）

---

---

古代絲綢之路沿線的宗教圖書館是一項跨地域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課題。在中國學界，不僅西方宗教圖書館的研究寥寥無幾，而且絲路西段的史地也同樣乏人問津。針對這些缺失，筆者選擇從上古地中海世界的宗教圖書館入手，結合絲綢之路西段的史地，簡單梳理分布於絲路沿線的美索不達米亞、小亞細亞、埃及、希臘—羅馬、以及拜占庭、波斯和中亞等地的神廟圖書室、聖所藏書室、修道院圖書館、穆斯林圖書館以及相關的宗教典藏。本文嘗試通過古代史、圖書館史、世界宗教以及古典學等多學科的視角，兼顧考古發掘和出土寫本，初步揭示地中海地區和絲路西段宗教圖書館的概貌。

**關鍵詞：**宗教圖書館 絲綢之路 圖書館史

羅馬到波斯——絲路西段的宗教圖書館初探

---

\*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絲路文化交流中的佛教寫本圖書館」（項目編號為17BTQ019）的階段性成果，同時，本文的寫作還得到了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UIC）以及北京師範大學歷史文化研究中心（RCHC）相關項目的支持。

## 引言

上古的地中海文明發源於兩河流域的城邦，向西一直延伸至羅馬不列顛，向東隨着波斯西征和馬其頓東征也繼而傳播到中央歐亞的大部分區域，所以廣義的古地中海文明包括了「五海之地」，也就是位於地中海、紅海、黑海、裏海與波斯灣之間歐亞大陸的廣袤腹地。<sup>1</sup> 從聖經時代開始到伊斯蘭教的勃興，這一文化碰撞之地不僅跨越了主要的多神教和一神教信仰，而且也是「絲綢之路」視域之下很少受到關注的「西段地區」。從西方視角來看，隨着雅利安人（Aryan）的四散征伐，絲綢之路早在公元前 2000 年就已經初具雛形，此時原始絲路的基本走向是從俄羅斯南部或中亞北部出發，經過伊朗高原，到達兩河流域，從這裡出發的商路四通八達，可以往西北橫穿小亞細亞，也可以取道西南經過巴勒斯坦到達埃及的尼羅河海港。

地中海世界不僅催生了西方文明，而且也是古代「宗教圖書館」的發源地。雖然圖書館史（library history）的學者很少使用「宗教圖書館」一詞，但是本文為了敘述的便利，將各類宗教教團及其附屬神廟設立的圖書館和檔案室，收藏有重要宗教圖書的公共和皇家圖書館、以及日後興起的各大宗教的神學圖書館，都籠統地劃歸「宗教圖書館」的範疇之中。在筆者看來，「宗教圖書館」的建立初衷是為了保存教派的聖典，其收藏範圍包括天啟的神諭（oracle），讚美詩、教團清規、祈禱用書、倫理讀物，以及少量世俗文獻。地中海周邊和波斯地區的圖書館史，特別絲綢之路西段視域下的古代宗教圖書館，在中國學術界一直鮮有學者問津。針對這一缺環，本文準備初步收集絲綢之路西端有關宗教圖書館的資料，爬梳的範圍則限定於公元前一千年起始的東部地中海和西亞地區，也就是美索不達米亞、小亞細亞、古埃及、希臘—羅馬世界（Greco-Roman World），以及西亞的波斯帝國，這一地理範疇也恰好是一帶一路國

1 趙汝清：《從亞洲腹地到歐洲——絲路西段歷史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25。

策中所倡議的陸地絲綢之路。

和所有橫亙在上古研究面前的難題一樣，地中海與西亞涉及的語言包羅古今，有關宗教圖書館的一手文獻往往夾雜在古典作品和碑刻銘文之中，加之考古發掘報告不易收集，前行研究匱乏，因此按照絲路的大概走向進行區域微觀研究的條件還未成熟，筆者只能在本文中做概要的論述，為日後中文學界闡發這一課題做個鋪墊。根據地中海和波斯地區宗教興起的時序，結合絲綢之路西段的空間轉換，本文將分成以下四個部分來逐次展開。第一部分是絲綢之路前史中涉及的宗教圖書館，也就是公元前334年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前356–前323年；前336–前323年在位）東征之前的美索不達米亞宗教，古埃及宗教以及上古的猶太教圖書館。第二部分從希臘北部馬其頓（Macedonia）的崛起開始，追溯希臘化（Hellenization）時代絲路東擴過程中興建的圖書館，直至羅馬初期的多神教圖書館。第三部分敘述的是東西羅馬帝國治下的絲綢之路與基督教圖書館的建立。在最後一部分，我們將關注羅馬的宿敵波斯，儘管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又稱拜火教或祆教）和摩尼教（Manichaeism）都曾經在西亞的絲路上傳播，但是我們的考察重點將落在絲路節點上的伊斯蘭教圖書館。鑑於西方學者對古代圖書館史已經積累了一定成果，所以本文的焦點是宗教圖書館與絲綢之路之間的聯繫以及在前行研究中還未能得到充分闡述的宗教因素。

## 一、絲路前史視域中的宗教圖書館

絲綢之路與其說是一條連通歐亞大陸的商道，還不如說是一種代表着文明之間互聯互通的理念和趨勢。從古希臘、波斯帝國、希臘化諸國到羅馬帝國，絲綢之路自西向東的開拓要早於漢朝對西域的經營。再往前推，雅利安人的西遷，古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的交往都相繼奠定了東地中海文化的基石，象徵着全球史語境中更為久

遠的西方「絲綢之路」。<sup>2</sup> 正是在這種「絲路前史」的視域之中，地中海世界的宗教圖書館誕生於兩河流域。毋庸諱言，這一時期的宗教圖書館往往是城市圖景中最為華麗的公共建築之一，而某些知名的圖書館因其難忘的歷史形象，在絲綢之路崛起後再次聲名遠播，成為各大文明效仿和超越的對象。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美索不達米亞的圖書文化，此地的信仰認為文字是上天賜予的禮物，在上古的神譜中，書寫之神納布（Nabu）身分尊貴，是主神馬杜克（Marduk）之子。此外，巴比倫的《祖之史詩》（Epic of Zu）也告訴我們，獅頭鳥身的怪物祖（Zu，又名Anzu）因為從主神恩利爾（Enlil）的聖殿之中盜取了決定眾神生死的命運石板（蘇：Dup Shimati，英：Tablet of Destinies）而被追殺。<sup>3</sup> 因此，在美索不達米亞人看來，書寫這一行為和本地區特有的泥板（clay tablets）文書都是神聖的象徵。不僅文字在神話中得到重視，美索不達米亞還是宗教圖書館的發源地。1975年，意大利探險隊在敘利亞的埃勃拉（Ebla）發現了人類最早的圖書館，時間的定位大約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埃勃拉靠近日後的絲路要道阿勒頗（Aleppo），古人多從兩河流域西入阿勒頗，然後南下大馬士革。這所位於埃勃拉的皇宮檔案室（archive）相當於一個圖書儲藏室，也就是原始圖書館的雛形，其時埃勃拉圖書的收藏已經包括了讚美

2 從西方的視角來看待絲綢之路的一部分作品，參看 Christopher Beckwith, *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拉烏爾·麥克勞克林 (Raoul McLaughlin) 著，周雲蘭譯：《羅馬帝國與絲綢之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年）；Nicola Di Cosmo and Michael Maas, *Empires and Exchanges in Eurasian Late Antiquity: Rome, China, Iran, and the Steppe, Ca. 250–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Brian McElney, *Romans on the Silk Road* (Hong Kong: Earnshaw Books, 2019).

3 本文所引用的外語名詞縮寫如下：阿：阿拉伯語；波：波斯語；德：德語；法：法語；拉：拉丁文；蘇：蘇美爾文；希：希臘文；希伯來：希伯來文；象：象形文字（hieroglyph）；英：英語（僅用於和書名的原文對照）。本文帶有概述的性質，因此地名、人名、專有名詞、教派以及約定俗成的英文轉寫則一般不加標注和發音符號。

詩、咒語以及神話傳說等宗教文書。<sup>4</sup>

出土於美索不達米亞的一些重要文獻揭示了早期文明和多神教信仰之間的緊密聯繫，而且部分考古發掘點恰好是上古時代的宗教中心。比如巴比倫城東南的尼普爾（Nippur）就出土過大洪水傳說的泥板，發掘地點是大型神廟圖書館的遺址，這一地區一直是蘇美爾時代（Sumerian Times，約前 3500–前 3200 年）的宗教中心。<sup>5</sup>到了前十世紀，亞述帝國（Assyrian Empire，前 2500–前 605 年）橫掃西亞，大多數亞述城市中心是一座建有圖書館的神廟，而且館內一般都設立繕寫室。人類最早的史詩《吉爾伽美什》（Gilgamesh Epic）就是在亞述國王阿蘇巴尼帕爾（Ashurbanipal，前 627 年卒；前 668 年–前 627 年在位）所創立的尼尼微（Nineveh）圖書館中出土的。<sup>6</sup>考古學家在收藏頗豐的圖書儲藏室中找到了十二塊刻有英雄史詩《吉爾伽美什》的泥板。這部用楔形文字（cuneiform）寫就的長詩其實帶有鮮明的多神教色彩，整部史詩摻雜了半人半神的國王吉爾伽美什和伊斯塔（Ishtar）、沙瑪什（Shamash）等兩河流域諸神之間的抗爭與妥協。這座圖書館建於前 668 年，其功用相當於現代的國家檔案館，只有神廟的抄寫員和宮廷的專業人士才被允許

- 
- 4 在埃勃拉出土的兩間書籍儲藏室之中，1.5 萬塊用於記事的泥版被排列放置在木架子上，而且藏書室和抄寫室已經各自獨立。在伊拉克的摩蘇爾（Mosul）和埃及的底比斯（Thebes）等地也出土過藏有泥版的圖書室。參看 Hans H. Wellisch, “Ebla: The World’s Oldest Library,” *The Journal of Library History* vol.16, no.3 (1981): 488–500；楊威理：《西方圖書館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年），頁 6–8；弗雷德·勒納（Fred Lerner）著，沈英、馬幸譯：《圖書館的故事——從文字初創到電腦時代》（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4 年），頁 6–11；詹姆斯·坎貝爾（James Campbell）著，萬木春、張俊譯：《圖書館建築的歷史》（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 年），頁 37–38；Paolo Matthiae, *Ebla: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105–106.
- 5 小野泰博（Ono Yasuhiro）著，闕法箴、陳秉才譯：《圖書和圖書館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 年），頁 25。
- 6 十九世紀中期（1845–1854 年）英國考古學家累亞德（Austen Henry Layard，1817–1894）和奧斯曼土耳其的考古學家拉薩姆（Hormuzd Rassam, 1826–1910）共同發掘了亞述帝國的古城尼尼微，參看 Timothy Larsen, “Austen Henry Layard’s Nineveh: The Bible and Archaeology in Victorian Britain,” *Journal of Religious History* vol.33, no.1 (2009): 66–81.

使用這座並非對外開放的圖書館。目前中文相關的敘述很少注意到這座圖書館其實是以書寫之神納布為中心的神廟圖書館的一部分。亞述人相信鎮守圖書館大門的守護神有主神阿舒爾（Ashur）、穀物女神寧利爾（Ninlil）、以及魚神達貢（Dagon）。<sup>7</sup> 早在薩爾貢二世（Sargon II，前 705 年卒；前 721–前 705 年在位）的時代，納布神廟及其圖書館就獲得了皇家的支持，這一傳統在阿蘇巴尼帕爾治下達至頂峰。<sup>8</sup> 阿蘇巴尼帕爾試圖系統性地收集當時已知世界的一切知識，他下令讓僧侶和書吏到各處的神廟中去搜尋失落的古代文獻，這其中也包括了大量的宗教文書，因此這座皇家圖書館除了擁有 1500 種各類文獻和政府公文之外，還包括專門用來收藏神諭和預言書的宗教圖書室。<sup>9</sup> 這所收藏豐富的神廟圖書館大約存在了半個世紀，到了公元前 612 年，裏海南岸的米提亞（Media）和幼發拉底河流域的巴比倫聯手攻陷了尼尼微，珍貴的阿蘇巴尼帕爾圖書館也隨之被焚毀。<sup>10</sup> 儘管如此，這座圖書館依然開風氣之先，據說世界的征服者亞歷山大大帝正是看到尼尼微的這座圖書館，才有了在亞歷山大城興建圖書館的想法。<sup>11</sup>

除了兩河流域，古代的宗教圖書館在地中海東岸的巴勒斯坦地區也有跡可循。古巴勒斯坦是希伯來人的聚居地，最早的猶太教圖書館也肇始於此。和周邊民族的多神教信仰不同，希伯來人在大約公元前 1200 年左右就形成了獨特的一神教。據《希伯來聖經》（Hebrew Bible）所傳，先知摩西（Moses）在西奈山領受的「十

7 坎貝爾：《圖書館建築的歷史》，頁 39–40。還可參看黃坤坊：〈古代亞述的尼尼微檔案圖書館〉，《檔案時空》1993 年第 4 期，頁 35；斯圖亞特·默里（Stuart Murray）著，胡焯譯：《圖書館——不落幕的智慧盛宴》（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2 年），頁 20–21；約翰·威利斯·克拉克（John Willis Clark）著，楊傳緯譯：《照管圖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2–3。

8 勒納：《圖書館的故事》，頁 9–10。

9 Wayne A. Wiegand and Donald G. Davis,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History (Garland Reference Library of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Garland Pub, 1994), 28.

10 Tzvi Abusch, “Ishtar’s Proposal and Gilgamesh’s Refusal: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Gilgamesh Epic’, Tablet 6, Lines 1–79,” *History of Religions* vol.26, no.2 (1986): 143–87.

11 弗雷德里克·凱尼恩（Frederic Kenyon）著，蘇傑譯：《古希臘羅馬的圖書與讀者》（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93。

誠」(Ten Commandments) 就是被刻在兩塊法版之上的誡命，並存放於神聖的約櫃（希伯來：Aron Habrit，英：Ark of the Covenant）之中，因此不妨將鑲着金邊的木制約櫃看作猶太書箱的雛形，畢竟後來的猶太教祭司和書籍抄寫員也常常使用木箱或者金屬箱來保存經卷。前 957 年，希伯來人的約櫃最終在耶路撒冷的猶太第一聖殿（The First Temple）之中找到它的安身之處。從後世聖殿的復原圖來看，約櫃被安置在聖殿最裡間的至聖所（Holy of Holies）之中，門口設有祭壇。此外根據天主教聖經《馬加比二書》(II Maccabees) 的記載，猶太先知尼希米（Nehemiah）還在第一聖殿之中另立了一個書庫，用來收藏聖書。<sup>12</sup> 到了公元前 586 年，巴比倫國王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II，前 630–前 562 年；前 604–前 562 年在位）率領大軍入侵耶路撒冷並焚毀了第一聖殿，約櫃至此下落不明。尼布甲尼撒的入侵所導致的「巴比倫之囚」（Babylonian captivity）激化了猶太民族的身分危機，猶太人需要借用經文去維繫流亡歲月中的身分認同，那怕這種「經典圖書館」只是一個用來存放文本的經箱。數個世紀之後，羅馬大軍在耶路撒冷的第二聖殿（The Second Temple）中劫掠了摩西經典並將它們作為戰利品帶回羅馬，據說皇帝維斯佩西安（Vespasian，9–79 年；69–79 年在位）在 75 年建立了一座公共圖書館，並將摩西經典之若干抄本貯存於該館。<sup>13</sup>

除了失落的約櫃，保存律法書也是猶太教固有的藏書文化。這些律法書包括了《希伯來聖經》中的《妥拉》(Torah)，後《妥拉》時期的《密釋納》(Mishnah) 以及在希伯來民族流亡期間編纂的百科全書式的《塔木德》(Talmud)。古猶太教的《希伯來聖經》——又稱《塔納赫》(Tanakh) ——其實就是一個便攜的小型經典圖書館。完整的《塔納赫》包含了 24 種來源不同的文本，抄寫在分散的羊皮卷 (parchment 或 vellum) 之上，其成書時間大約是在公元

12 天主教聖經中的《馬加比二書》第二章 (II Maccabees 2:13–14)，參看 David McLain Carr, *The Formation of the Hebrew Bible: A New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58.

13 詹森 (Elmer D. Johnson) 著，尹定國譯：《西洋圖書館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 年)，頁 65。

70 年以前。<sup>14</sup> 整部《塔納赫》包括了所謂的後流放時代（post-exilic period）產生的來源不同的典籍。我們注意到在英文約定俗成的表達之中，《希伯來聖經》的章節其實都被稱作「書」（Book），這多少反映了經文編輯完成之前這些單一抄本所呈現的寫卷狀態。而且有些聖經學者還認為，地位顯赫的抄寫員的辦公室也是存放歷史作品和預言文學的存儲室。<sup>15</sup>

除了小而全的《塔納赫》和猶太聖殿的圖書室，耶路撒冷可能還另設有猶太教的圖書室，用於收藏摩西經典以及歷代君王和先知的典籍。但是這一圖書室和希伯來人一樣命途多舛，在前 1000 年之後數次被毀並重建。《妥拉》中的數章——如《以斯拉記》（Ezra）以及《列王紀下》（Second Kings）等書——皆多次暗示這一宗教圖書室的存在。<sup>16</sup> 在聖殿被毀之後，《妥拉》就替代了約櫃，被存放在猶太會堂（Synagogue）以及之後興起的各種猶太人的教學機構之中（如 Talmud Torah, Bet Midrash 和 Yeshivah 等），也有觀點認為，猶太會堂保存典籍的另一目的是防止偽經的出現。<sup>17</sup> 早期的猶太會堂在講壇（Bimah）之處一定會放置一部《妥拉》卷軸（希伯來：Sefer Torah，拉：volumina），這是一個固定在軸棍（umbilicus）之上的較長的羊皮寫卷。這種卷軸版的裝幀正是猶太教經典與基督教《聖經》的區別之一，後者採用的是把頁面粘貼在一起的冊頁版（codex）。這種卷軸裝的《妥拉》在會堂之中被安放在約櫃的翻版——「聖約櫃」（希伯來：Aron Hakodesh）之中，後者看起來更像是一件藝術品。《妥拉》卷軸和聖約櫃組成一座迷你圖書館，每逢在

14 《塔納赫》由律法書《妥拉》（即「摩西五經」，希：Pentateuch）、歷史作品《先知書》（Nevi'im）、以及各種文學的集成《聖傳》（Ketuvim）這三部分構成。

15 《耶利米書》第 36 章（Jeremiah 36:10），參看 Edward Edwards, *Libraries and Founders of Libra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9.

16 詹森（Elmer D. Johnson）著，尹定國譯：《西洋圖書館史》，頁 45。

17 Giuseppe Veltri, *Libraries, Translations, and 'Canonic' Texts: The Septuagint, Aquila and Ben Sira in the Jewish and Christian Traditions*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6), 27; Isaiah Sonne and Naomi Steinberger, "Libraries," in *Encyclopaedia Judaica*, vol.12, eds. Michael Berenbaum and Fred Skolnik (Farmington Hills: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2007), 783–88.



儀式中需要誦讀經卷的時候，就可以從聖約櫃中取出卷軸放在講壇的讀經桌（希伯來：Shulchan）上，並展開書卷進行誦讀。總之，在中世紀歐洲的猶太學校圖書館流行之前，耶路撒冷的聖典圖書館以及散落在地中海各處的猶太會堂或多或少為流亡的猶太族群提供了教育機會和心靈慰藉。

二十世紀的考古發掘，特別是 1947 年以來在巴勒斯坦死海的西北岸陸續出土的《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也稱庫蘭抄本）為我們提供了公元前後猶太教團圖書館的一手資料，值得從圖書館史的角度概述其要。《死海古卷》以及 1951 年以後在庫蘭岩洞（Qumran Caves）中陸續清點出來的殘卷構成了一座原始的猶太教書庫，其收藏的重點是《塔納赫》以及地區教團的宗派文獻。鑑於這些文庫是有計劃、有目的地保存起來，因此部分學者乾脆把這個文獻群命名為「庫蘭圖書館」（Qumran Library），並將其和一些古代圖書館加以對比研究。<sup>18</sup> 時至今日，圍繞《死海古卷》而展開的研究已經成為專業的「庫蘭學」（Qumranology）。<sup>19</sup> 庫蘭古卷的殘片數以萬計，大多是保存在一系列洞穴中的數個陶罐之中，這些殘片多達 600 餘種，被抄寫在羊皮紙或紙莎草紙（papyrus）上，文獻的年代介於公元前一世紀和公元一世紀之間。無獨有偶，在絲綢之路的另一端，一些在中亞地區出土的古老佛經，也是以殘卷的形式被保存在陶罐中。1991 年《死海古卷》的全部卷冊得以發表，此後「死海古卷」這個猶太經卷的專有名詞便帶有廣泛的象徵意義，時常被西方用來指代古代出土的寫卷。因此阿富汗所發現的古代佛經寫卷

18 希歐多爾·H·加斯特（Theodore H. Gaster）著，王神萌譯：《死海古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年），頁 7。有關庫蘭圖書館的討論和比較研究，參看 Sidnie Crawford, ed., *The Dead Sea Scrolls at Qumran and the Concept of a Library*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5)。

19 相關英文文獻，參看 Powell Davies, *The Meaning of the Dead Sea Scrolls*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56); Frank Moore Cross, *The Ancient Library of Qumra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5); Brad Burnham, *Qumran Caves: Hiding Place for the Dead Sea Scrolls* (New York: PowerKids Press, 2003); Armin Lange, “Pre-Maccabean Literature from the Qumran Library and the Hebrew Bible,” *Dead Sea Discoveries* vol.13, no.3 (2006), 277–305。

也一度被《泰晤士報》稱作「佛教的死海古卷」(Buddhist 'Dead Sea Scrolls')，而且也有學者將《死海古卷》和絲路西域段出土的摩尼教文獻相對比，這一東西方手稿文化的相似性也為我們比較絲路兩端的宗教圖書館提供了一個可行的切入點。<sup>20</sup>

除了地中海東岸，猶太教的圖書館在絲綢之路的別處還有跡可循。離開了巴勒斯坦，猶太人在中東大地上開枝散葉，成為活躍於絲綢之路西端的商人。順着中東的商道，猶太教傳入西北的克里米亞(Crimea)和北高加索地區，其中也包括了雄踞西亞絲路北道的可薩突厥人(Khazars)的領地。可薩突厥原屬西突厥，西突厥滅亡之後，從中亞到拂菻(拜占庭)之間的絲路北道途經可薩突厥汗國，可薩突厥也乘勢崛起為南俄草原的霸主。經過一番抉擇，可薩突厥人最終選擇了猶太教作為國教，摩西的經典也傳到此地。<sup>21</sup>除了高加索，另有一部分猶太人遠至中亞，足跡遍布絲路名城布哈拉(Bukhara)、撒馬爾罕(Samarkand)以及杜桑貝(Dushanbe)等處。<sup>22</sup>更有甚者，越過裏海和中亞的群山，猶太教的文獻甚至出現在遙遠的西域。出土於新疆絲路丹丹烏里克(Dandan Oilik)的希伯來文書信以及敦煌遺書中的希伯來祈禱文(P.1412)都證實了猶太人在漢唐邊疆的行商活動。儘管絲綢之路從西向東都能發現猶太人的蹤跡，但是絲綢之路上猶太教圖書館的蛛絲馬跡，還有待進一步的鉤沉。

巴勒斯坦的西南就是《妥拉》中多次提到的古埃及。在絲綢之路的北非版圖上，埃及境內有文化中心開羅和港口城市亞歷山

20 林主榮(Timothy H. Lim)著，傅有德、唐茂琴譯：《死海古卷概說》(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年)，頁142。詳情參看《泰晤士報》，1996年6月6日的報導以及《美國圖書館》(*American Libraries*)雜誌的簡訊“British Library Acquires Rare Buddhist Scrolls,” *American Libraries* vol.2, no.8, (1996), 23.

21 可薩突厥人皈依猶太教的經過，參看桂寶麗：《可薩突厥》(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75-82；還可參看Constantin Zuckerman, “On the Date of the Khazars' Conversion to Judaism and the Chronology of the Kings of the Rus Oleg and Igor. A Study of the Anonymous Khazar Letter from the Genizah of Cairo,” *Revue des Etudes Byzantines* vol.53 (1995), 245.

22 參看張詠梅：〈中亞猶太人與絲綢之路〉，《文博》1997年第4期，頁45-47。

大（Alexandria），同時往南還有深入非洲內陸的網狀商道分支。儘管埃及學家很少談及古埃及在陸地絲綢之路中的角色，但是紅海的港口在海上絲綢之路的時代確實發揮了作用。和猶太的一神教相比，埃及的多神教信仰異常豐富，以至於希羅多德（Herodotus，前484–前425年）也稱讚埃及人，說他們「比任何民族都遠為相信宗教」。<sup>23</sup> 和地中海的其他地區一樣，上下埃及宏偉的神廟也設有圖書檔案室並收藏宗教聖典和禮儀文書，神廟圖書館有時也被稱作「生命之屋」（象：pr-ankh，英：House of Life）或「書卷之屋」（象：pr-medjat，英：House of Book-Scrolls），入藏各類參考圖書。<sup>24</sup> 相傳埃及神廟圖書館最初的藏書就是學問之神圖特（Thoth）所著的《圖特之書》（*Book of Thoth*），這其實是一部集神廟藏書，咒語以及相關注釋書籍為一體的文獻集成，《圖特之書》自成體系，算是一種小規模的圖書館特藏。<sup>25</sup> 神廟圖書館中的寫本自然採用埃及本地出產的紙莎草書，希臘世界的圖書館也廣泛使用這種紙張，能夠利用這些文獻的人顯然包括了在神廟中受過教育的僧侶。有關古埃及圖書館史的研究大多關注兩位法老阿門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前1411–前1379年；前1413–前1377年在位）和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II，前1303–前1213年，前1279–前1213年在位）所建的圖書館，其中拉美西斯二世的圖書館又被稱作「靈魂施療所」，日本圖書館史學者小野泰博（Ono Taihaku，1927–1990年）認為這座皇家圖書館與其說是政府文書館，還不如說是一個宗教圖書館。<sup>26</sup>

23 希羅多德（Herodotus）著，王以鑄譯：《歷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126。

24 Wiegand,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History*, 154; Günter Burkard, “Bibliotheken im alten Ägypten: Überlegungen zur methodik ihres nachweises und übersicht zum stand der forschung,” *Bibliothek: Forschung und Praxis* 4/2 (1980): 79–115; Ian Rutherford, *Greco-Egyptian Interactio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Culture, 500 BC–AD 30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6.

25 詹森（Elmer D. Johnson）著，尹定國譯：《西洋圖書館史》，頁42。Richard Jasnow and Karl-Theodor Zauzich, *The Ancient Egyptian Book of Thoth: A Demotic Discourse on Knowledge and Pendant to the Classical Hermetica*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5).

26 小野泰博：《圖書和圖書館史》，頁26。

除此之外，有關埃及宗教圖書館的確切記載並不常見。古典作家尤斯塔修斯（Eustathius，300–337年）宣稱在開羅附近的孟菲斯（Memphis）古城中有一座皮塔神廟（Temple of Phtha）圖書館，他的記述還穿鑿附會了荷馬（Homer）的傳說。<sup>27</sup> 從孟菲斯往南，考古學家在尼羅河上游第一瀑布附近的費列島（Philae）區域曾經辨認出兩個古代神廟圖書館的遺跡。其中的一個宗教圖書館獻給掌管生育和繁殖的女神愛西絲（Isis），這位在地中海各處都聞名遐邇的女神也是埃及豔后克麗奧佩特拉七世（Cleopatra VII，前69–前30年；前51–前30年在位）的守護神。第二個神廟圖書館建於公元前209年，位於上埃及的小鎮埃德富（Edfu，又名厄多福），這是一座附屬於荷魯斯神廟（Temple of Horus）的寺院圖書館。鷹頭的荷魯斯是法老的守護神，在埃及神譜中排名靠前。德國學者用「bibliothekai」一詞來描述這座「圖書館」，事實上，單數的「bibliothekē」的意思是用於放置長卷的書架，因此這個詞的複數形式指的是由兩個書架組成的神廟圖書館。這一圖書館的固定設備（德：Bibliothek Einbau）是在馬其頓國王托勒密·攸基斯二世（Ptolemy Euergetes II，前116年卒；前146–前117年在位）統治埃及時期建造完成的。荷魯斯神廟中的兩個書架分別鑲嵌在神廟中部一座牆壁的左右兩側，這堵牆橫截了神廟，正好分隔出內外兩組空間。鑑於上古時期的文本十分寶貴，放滿兩個書架的藏書就能被稱為一座圖書館也並不讓人感到意外。不僅如此，由於這個神廟圖書館的構造和位於底比斯的拉美西姆神廟（Ramesseum at Thebes）的圖書館十分相似，所以我們認為神廟圖書館大概是埃及神廟的標配。<sup>28</sup> 一般來說，這種圖書館的重點收藏總是和神廟享祀的神靈有關，因此書籍的數量不會太多。在費列島的神廟之中，埃及學家在石牆左右的壁龕附近還發現了一部燒錄在牆上的包含了37部書籍的古代圖書目錄。除了宗教文書，有些神廟中還有天文曆法、藥物、

27 Edwards, *Libraries and Founders of Libraries*, 5.

28 Luciano Canfora, *The Vanished Library: A Wonder of the Ancient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77, 157–60.

獸醫學、喪葬、夢書、魔法以及歷史和地理等科目的雜書。<sup>29</sup>

## 二、亞歷山大到帕加馬：希臘化絲路上的多神教圖書館

到了公元前最後的 700 年，古埃及屢遭外族入侵，並最終演變成希臘世界的一個行省。與此同時，在黑海以北，斯基泰人（Scythian）控制了從南俄到阿爾泰山的草原絲綢之路，並從事黃金和皮毛貿易。大約從前八世紀開始直到公元五世紀左右，希臘、馬其頓和接踵而起的羅馬逐漸征服了地中海世界，開創了西方文明史上輝煌的古典時期（Classical Antiquity）。希臘雖然信奉多神教，但是卻缺乏專門的宗教圖書館，宗教文書大多和世俗文獻一併入藏於神廟或公私圖書館之中，所以古希臘的圖書館一般都和雅典哲學學派以及傑出的思想家有關。神廟是希臘城邦建築群所謂聖所（sanctuary）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和祭壇，劇場、圖書館乃至書店等建築一起構成了所謂的聖域（希：temenos）。<sup>30</sup> 很可能稍有規模的希臘神廟都配有圖書室，其中藏有紙莎草紙文獻，但是我們對這種建築所知甚少。

前 338 年，希臘城邦同盟被來自北方的馬其頓所擊敗。在隨之而來的是長達數百年的希臘化時代（Hellenistic Age，約前 323–公元 31 年），埃及被納入馬其頓的帝國版圖以及之後的托勒密王朝

29 Fayza M. Haikal, “Private Collections and Temple Libraries in Ancient Egypt,” in *What Happened to the Ancient Library of Alexandria?*, ed. Mostafa El-Abbadi and Omnia Fathallah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8), 39–55. 還可參看 William MacQuitty and Betty MacQuitty, *Island of Isis: Philae, Temple of the Nile* (New York: Scribner, 1976)。埃及圖書館史的著作都會提及《埃及亡靈之書》（*Egyptian Book of the Dead*，又名「死者之書」），這是古埃及社會中與喪葬密切相關的文書。「亡靈書」的內容是幫助死者通過死後所面臨的諸神的審判，並證明自己清白無罪。所謂的「亡靈書」是不同時期的喪葬文獻的統稱，並不代表一本獨立的經典或者一個完整的圖書館，但是我們很難想像埃及的神廟圖書館會把亡靈書排除在館藏之外。參看金壽福譯注：《古埃及〈亡靈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年），頁 1–24。

30 希臘宗教場所的詳情，參看西蒙·普萊斯（Simon Price）著，刑穎譯：《古希臘人的宗教生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54–78；Mary Emerson, *Greek Sanctuaries and Temple Architecture*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8).

(Ptolemy Dynasty, 前 305– 公元 30 年)。略早於此時，埃及的亞歷山大城湧現了著名的寫本圖書館（約建於前 290 年）。無獨有偶，在希臘化世界的另一端，位於小亞細亞（Asia Minor, 今土耳其）西北部的帕加馬（Pergamum 或 Pergama）王國，也出現了著名的帕加馬圖書館（Library of Pergamum 或 Pergamene Library）。亞歷山大和帕加馬不僅是絲路名城，而且這兩座圖書館在絲綢之路上也是名聲顯赫。

鑑於西方學界對這兩座圖書館已經有了一定研究，本文只想強調在現有成果中經常被忽視的宗教因素。埃及北部的亞歷山大城北望地中海，無論王朝如何更替，這座名城始終是絲綢之路西端的重要節點。在漢代絲綢之路的版圖之上，這條連接中原、西域、西亞、北非以及遙遠的「大秦」主幹道在經過伊朗高原幹道和兩河流域的商路之後又出現了數個分支，其中之一就是位於敘利亞的古城帕爾米拉（Palmyra），從這裡往西南方向經過大馬士革、耶路撒冷和開羅，最終北上可以到達被《魏書·西域傳》稱之為「犁軒」的亞歷山大城。<sup>31</sup> 中國人很早就從中亞的大夏（Bactria）那裡得知了有關埃及的情況，漢武帝（前 156– 前 87 年；前 141– 前 87 年在位）之時，外交使節張騫（前 114 年卒）曾經派遣副使訪問過這座城市。<sup>32</sup>

亞歷山大圖書館（Library of Alexandria）坐落於猶太——希臘文化氛圍濃郁的亞歷山大城，其館藏的目的是收集有關希臘文化世界（希：Oikumene）的所有圖書，在吸納了各種私人藏書之後，亞歷山大圖書館最終擁有了引以為豪的希臘文獻收藏。雖然這些紙草圖書的收藏並不僅限於多神教，但是這座圖書館的確是位於一座名為「繆斯神殿」（希：Mouseion, 又名「藝術與科學女神之宮」）的

31 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31；Iain Gardner and Macquarie University, eds., *From Palmyra to Zayton: Epigraphy and Iconography* (Turnhout, Belgium: Brepols, 2005), 1–4. 大秦即古羅馬帝國，另一說指埃及亞歷山大城或地中海沿岸東部及中央歐亞地區的希臘人。還可參看《後漢書》卷八八《西域傳》以及《魏書》卷一百二《西域傳》，「大秦國一名犁軒，都安都城。」

32 林梅村：《絲綢之路考古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117–122。

神廟建築之內。這座神殿據說還包括了研究室，演講廳和觀星台，其規模和位於雅典的學院或博物館類似，因此也被稱作「亞歷山大博物館」。<sup>33</sup> 亞歷山大圖書館的分館則隸屬於賽拉皮斯神殿（Temple of Serapis，又名 Serapeion，或譯為六翼天使寺），位於亞歷山大城的西南方，賽拉皮斯的信仰流行於希臘和埃及地區，後來逐漸演化成希臘—羅馬世界共同的神靈，賽拉皮斯神殿圖書館（Library of the Serapion）擁有炫目的廊柱，裝飾也十分華麗。<sup>34</sup> 作為希臘文明的標杆，亞歷山大圖書館的建立意在使埃及希臘化，不過當希臘化世界和羅馬共和國融合之後，亞歷山大城依然是埃及行省的學術和宗教中心。正是在這種書香縈繞的氛圍之中，亞歷山大圖書館興盛了兩百年，直至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從公元前 47 年到公元 273 年，羅馬的凱撒（Julius Caesar，前 100–前 44 年）和後來的羅馬皇帝相繼征服埃及，焚毀了這座繆斯圖書館的大部分建築。公元 391 年，在基督教的大主教西奧菲盧斯（Theophilus，412 年卒）的授意之下，賽拉皮斯神殿圖書館也遭到破壞。<sup>35</sup>

第二座希臘化圖書館的典範是位於小亞細亞商道要衝的帕加馬圖書館。和亞歷山大圖書館一樣，帕加馬圖書館並沒有多神教色彩，不過這座圖書館依然是一座希臘聖所的組成部分。考古發掘表明，帕加馬圖書館位於一座雅典娜神殿（Temple of Athena）遺址區

33 克拉克：《照管圖書》，頁 5–7。

34 據說亞歷山大圖書館還為修訂《希伯來聖經》的首個希臘文「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提供了助力，參看詹森：《西洋圖書館史》，頁 53–57。有關亞歷山大圖書館，還可參看 Luciano Canfora, *La bibliothèque d'Alexandrie et l'histoire des textes* (Liège: CEDOPAL, 1992); Andrew Erskine, "Culture and Power in Ptolemaic Egypt: The Museum and Library of Alexandria," *Greece & Rome* vol.42, no.1 (1995): 38–48; Kelly Trumble and Robina MacIntyre Marshall, *The Library of Alexandria* (New York: Clarion Books, 2003); Roy MacLeod, *The Library of Alexandria: Centre of Learning in the Ancient World* (New York: I.B. Tauris, 2004).

35 參看 Jon Thiem, "The Great Library of Alexandria Burnt: Towards the History of a Symbo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40, no.4 (1979): 507–26; Daniel Heller-Roazen, "Tradition's Destruction: On the Library of Alexandria," *October* 100, no.1 (2002): 133–53; 約翰·桑茲 (John Sandys) 著，張治譯：《西方古典學術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一卷，頁 119–122。

的西北角，而圖書館建築佔據了一排雙層柱廊的上層，擁有開闊的景色。帕加馬圖書館包括四間圖書室，在最大的書屋之中還設有一尊高約 3.6 米的雅典娜雕像，據說是雅典帕提農神廟（Parthenon）同名神像的複製品，而後者是藝術大師菲迪亞斯（Phidias，約前 5 世紀）的傑作。<sup>36</sup> 雅典娜也是帕加馬古城的保護神，不過這座聖所遺址的第三層還設有華麗的宙斯祭壇（Altar of Zeus），該祭壇的複製品目前還保存在柏林的帕加馬博物館（德：Pergamonmuseum）。在圖書史上，帕加馬圖書館也有其特殊的貢獻。前二世紀，因為戰爭而導致紙莎草紙短缺促使帕加馬圖書館的工匠開始鞣革並製作比紙莎草紙更為耐用的羊皮紙，因此羊皮紙又被稱作佩加蒙紙（拉：Charta Pergamena）。猶太教的《塔納赫》就是寫在羊皮紙上的經典，而且大部分的基督教文獻也使用羊皮紙。<sup>37</sup> 前 133 年帕加馬陷於羅馬人之手，後者對帕加馬人引以為豪的圖書館讚賞有加，據說雅典哈德良圖書館（Hadrian's Library）的興建也是為了比肩帕加馬圖書館。文豪普魯塔克（Plutarch，約 46–120 年）在《希臘羅馬名人傳》（希：*Bioi Paralleloi*，英：*Parallel Lives*）中暗示我們，羅馬的大將安東尼（Marcus Antonius，前 83–前 30 年）將帕加馬圖書館贈予埃及豔后，據說其中的典藏屆時已經達到了 20 萬卷。<sup>38</sup>

希臘化時代經營的絲綢之路並沒有止步於帕加馬圖書館。只要回顧一下希臘大敵波斯帝國的歷史，就知道居魯士（Cyrus the Great，前 529 年卒；前 559–前 529 年在位）或大流士（Darius

36 帕加馬圖書館隱藏在陡峭山頂的一片建築群之中，聖所的平面圖和遺址照片，參看坎貝爾：《圖書館建築的歷史》，頁 42–45。圖書館內的詳細布局，參看詹森：《西洋圖書館史》，頁 59；Richard Evans, *A History of Pergamum Beyond Hellenistic Kingship*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4), 127–28. 從 1876 年到 1886 年，德國考古學家發掘了帕加馬古城，並初步揭示了帕加馬圖書館的面貌。德國人好古成癖，醉心於古希臘的研究，參看查理斯·弗里曼（Charles Freeman）著，李大維、劉亮譯：《埃及、希臘與羅馬》（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0 年），頁 877–881。

37 Richard Johnson, “Ancient and Medieval Accounts of the ‘Invention’ of Parchment,” *California Studies in Classical Antiquity* 3, (1970): 115–22.

38 普魯塔克（Plutarch）著，席代岳譯：《希臘羅馬名人傳》（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9 年），頁 1682。



the Great，前 550–前 486 年；前 522–前 486 年在位）等帝王已經建立了自西向東用於貿易和征伐的禦道。到了亞歷山大時代，從中亞到地中海的絲路西段，已經交通大開。波斯橫跨三大洲的擴張和希臘化時代的東征開創了絲綢之路從小亞細亞向中東和西亞拓展的歷史。這些征伐將各種文化、民族、知識體系以及宗教信仰連成一體，使它們相互交融和借鑑，顯著的例證包括紙莎草紙在東地中海世界的傳播、希臘神廟在中亞各地的遺存、埃及的阿瑪納宗教（Amarna Religion）對猶太—基督教發揮的影響等等。<sup>39</sup>

僅以絲綢之路地中海段的希臘化圖書館為例，由於圖書的出口貿易已經遠達希臘在黑海的各處殖民地，加之希臘人對於教育（希：paideia）的重視，圖書館的數量也在逐步增加。依靠銘文、史乘以及少量的考古實證，我們得知這一時期的圖書館大多位於希臘化的皇宮以及城市的神廟建築之內。除了亞歷山大和帕加馬，在馬其頓的佩拉（Pella）、帕加馬以南的士麥那（Smyrna，今伊茲密爾）、米拉斯（Mylasa 或 Milas）、港口城市寇斯（Kos）、以及著名的羅德島（Rhodos）都設有圖書館。<sup>40</sup> 希臘風格的神殿和圖書館也同樣延伸到了中亞地區。1966 年，法國考古學家在阿富汗帕米爾地區的絲綢之路小國阿伊·哈努姆（Ai Khanum 或 Ai Khanoum）發現了衛城（acropolis）、銘文、神殿石柱、紙草殘片、劇場以及檔案圖書館（archival library）的痕跡。有希臘神廟和劇場的地方，往往也能找到古代圖書館的蛛絲馬跡，但是中亞地區希臘化圖書館的詳情還需要進一步研究。<sup>41</sup>

39 參看郭丹彤：《埃及與東地中海世界的交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頁 137–160。

40 威特基（Anne-Maria Wittke）、奧爾斯豪森（Eckart Olshausen）、希德拉克（Richard Szydlak）主編，葛會鵬、古原馳、史湘潔、王聰譯：《古代世界歷史地圖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年），頁 118–119。希臘化世界的圖書館概況，參看 Herman Vleeschauer, *History of the Western Library* (Pretoria: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1963); S. Johnstone, “A New History of Libraries and Books in the Hellenistic Period,” *Classical Antiquity* 33, no. 2 (2014): 347–93.

41 Claude Rapin, “Les textes littéraires grecs de la trésorerie d’A Khanoum,” *Bulletin de Correspondance Hellénique* 111 (1987), 259–65; 沃爾班克（F. W. Walbank）著，陳恒、茹倩譯：《希臘化世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46–47。

前 168 年，羅馬征服了希臘的霸主馬其頓王國，進而繼承了希臘化的遺產，這其中也包括了奧林匹斯的多神教體系和希臘化的圖書館，與此同時，大量的希臘紙莎草書也流入羅馬地區。和希臘的「宗教圖書館」一樣，羅馬雖然以公共圖書館著稱，但是因為羅馬宗教缺乏核心的經典，因此專門的宗教圖書在神廟之外就難覓其蹤。<sup>42</sup> 不過羅馬的許多神廟附設了培養僧侶的學校，因此在其聖堂的壁龕之中亦藏有宗教經書以及大量世俗文書。例如有一種書寫於亞麻布上的「麻書」（拉：Libri Lintei），就是羅馬共和國早期的政治文獻官吏志（拉：Libri Magistratum），收藏於羅馬卡皮托利山（Capitol Hill）上的莫內塔神殿內（Temple of Moneta）。<sup>43</sup> 莫內塔是古羅馬神話中「記憶女神」或者主神朱諾（Juno）的別名，此處的神殿應該是供奉朱諾的廟宇。

在絲綢之路上，以羅馬神明來命名的圖書館還有一些其他例證。前 100 年，也許是受到亞歷山大圖書館的啟發，羅馬商人梅龍（Maron）在絲路重鎮小亞細亞的安條克（Antioch，又名安提阿）捐建了一座以「繆斯女神」來冠名的聖殿圖書館（Shrine of the Muses）。54 年，羅馬政治家蓋烏斯·阿西尼烏斯·波利奧（Gaius Asinius Pollio，前 76–4 年）將一座自由女神神廟（Temple of Liberty）改建為羅馬首家公共圖書館。<sup>44</sup> 28 年，羅馬皇帝奧古斯都（Augustus，前 63–14 年；前 27– 公元 14 年在位）在羅馬七丘（拉：Septem Montes Romae）之一的帕拉蒂尼山（拉：Mons Palatinus）上建造了兩座圖書館，開創了羅馬圖書館分別收藏希臘和拉丁文書籍的先河。由於圖書室就設在前 28 年完工的阿波羅神廟（Temple of Apollo）之中，所以圖書館也被命名為阿波羅

42 楊威理：《西方圖書館史》，頁 25。

43 詹森（Elmer D. Johnson）著，尹定國譯：《西洋圖書館史》，頁 63。萊斯莉·阿德金斯（Lesley Adkins）、羅伊·阿德金斯（Roy Adkins）著，張楠譯：《古代羅馬社會生活》（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年），頁 268。

44 Wiegand,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History*, 555. 羅馬圖書館史中有關宗教圖書館的一些史籍鉤沉，參看詹森：《西洋圖書館史》，頁 63–69。

圖書館。<sup>45</sup> 大約在同一時代，羅馬帝國南部龐貝城（Pompeii）的城市廣場（Pompeian Forum）附近，似乎也建有一所宗教圖書館，雖然學者們對這座建築的具體功用還未達成一致的意見。<sup>46</sup> 眾所周知，龐貝古城在 79 年維蘇威火山爆發後即被埋在火山灰下，直到十八世紀，考古發掘工作才逐漸揭示出龐貝城市廣場的布局。羅馬的城市廣場延續了希臘城邦廣場（agora）的格局，它們不僅是城市政治生活的中心，同樣也兼具重要的宗教功能。1823 年，法國考古學家逐步清理出龐貝城的若干遺跡，他們發現城市廣場的核心建築是朱庇特、朱諾和密涅瓦神殿（Temple of Jupiter, Juno and Minerva），這種三神一體的建築組合在羅馬宗教中被稱作「卡皮托利的三神廟」（Capitoline triad）。<sup>47</sup> 但是根據遺址所測繪的廣場平面圖顯示，在羅馬征服之前就存在的阿波羅神殿依然佔據了城市中心的顯耀位置。這座疑似為圖書館的建築就坐落於朱庇特神殿入口處的右側，這座建築的兩壁之上開鑿了許多放置書籍或者神像的壁龕，這一點和帕加馬圖書館的圖書室類似。<sup>48</sup>

到了二世紀，另一個和宗教典籍有關的圖書館再次把我們帶回到羅馬統治下的帕加馬城。在 140 到 175 年之間，這座以帕加馬圖書館聞名的古城又重新修建了一座「阿斯克勒庇俄斯聖所」（Sanctuary of Asclepius），這一壯觀的建築群包括一座圓形的模仿羅馬萬神殿（Pantheon）而建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廟（拉：Aesculapium，希：Asclepieion），一座規模不小的圖書館以及劇場等建築。這座長方形圖書館位於聖所的東北部，佔地面積比圓形神廟稍小。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是希臘—羅馬時代的醫藥之神，據說會在患者的夢中現身並治癒他們的疾病。鑑於希臘羅馬的

45 克拉克：《照管圖書》，頁 12。

46 Lawrence Richardson, *Pompeii: An Architectural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273–75.

47 羅伯特·埃蒂納（Robert Etienne）著，王振孫譯：《龐培——掩埋在地下的榮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 年），頁 23–28。

48 Mary Beard, John A. North, and S. R. F. Price, *Religions of Rome*, vol. 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99–101.

圖書館有時也設在醫學院之中，我們可以推測這座圖書館可能保留了許多有關神聖醫療的宗教文獻。<sup>49</sup>

### 三、羅馬絲綢之路上的基督教圖書館

又過了大約兩個世紀，自從康斯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274–337年；306–337年在位）執政之後，基督教終於擺脫了受迫害的命運，並最終躍升為羅馬帝國的國教。這一事件也終結了地中海地區在多神教的聖殿中設立圖書館的歷史。391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一世（Theodosius I，346–395年；379–392年在位）下令關閉異教徒的神廟，通常附屬於神廟的圖書館也隨之被荒廢和遺忘。代替神廟圖書館的是收藏基督教圖書的、規模不一的修道院圖書室、繕寫室、圖書館、以及教堂和隱修會的藏書。儘管如此，基督教圖書館還是保留了多神教圖書館的羅馬風格並持續入藏希臘—羅馬的經典作品，某些基督教圖書館的淵源也自然可以追溯到亞歷山大或帕加馬的圖書館。為了敘述方便，以下我們將羅馬境內絲路沿線的宗教圖書館分成西羅馬帝國（以意大利為主）以及十世紀之前的東羅馬帝國（主要是395年之後的拜占庭帝國）兩個部分，本文討論的地理範疇也會根據絲綢之路的走向更多地集中在羅馬世界的東方部分。

一世紀，隨着基督教在黎凡特（Levant）地區的快速崛起，早期的基督教書卷從埃及經由巴勒斯坦和敘利亞向西北方向傳播。大概從二世紀開始，基督教圖書的典型形態——抄寫在羊皮卷上的冊葉本——開始替代多神教常用的紙莎草紙和卷軸本，這一過程大約持續到五世紀初。<sup>50</sup> 同樣，在大小不一的羅馬圖書館之中，基督教文獻也逐漸取代了希臘—拉丁文學，以至於在文獻學史料中，已經很

49 西蒙·普萊斯（Simon Price）著，刑穎譯：《古希臘人的宗教生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27–128。

50 雷諾茲（L. D. Reynolds）、威爾遜（N. G. Wilson）著，蘇傑譯：《抄工與學者——希臘、拉丁文獻傳播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34–37。

難考索四世紀之後圖書館收藏古典作品的記載。<sup>51</sup> 早期的基督教圖書館保存了《新約聖經》( *New Testament* ) 的希臘文冊頁本。除了銘文和抄本，書史學者也可以借助馬賽克鑲嵌畫 ( *mosaic* )、陵墓壁畫或淺浮雕來推測羅馬圖書館的實景和經卷的實物。比如意大利東北部港口拉文納 ( *Ravenna* ) 的加拉·普拉西狄婭皇后 ( *Empress Galla Placidia* , 390–450 年 ) 陵寢就保存了一幅繪有書櫃的鑲嵌畫，畫面被兩層的書櫃佔據，裡面依次排放着冊頁版的四部福音書 ( *four gospels* )。<sup>52</sup>

修道院 ( *Monastery* ) 是基督教藏書的重鎮，除了神學著作，修道院還收藏文史、哲學和音樂等多方面的書籍。兼收並蓄是羅馬修士卡希歐多爾 ( *Flavius Magnus Aurelius Cassiodorus* , 約公元 487–583 年 ) 為修道院圖書館設定的原則。卡希歐多爾效仿亞歷山大圖書館，在意大利南部創立了維瓦留姆 ( *Vivarium* ) 修道院學校。他的目錄學著作《神性文獻和世俗文獻提要》( 拉： *Expositio Psalmorum* , 英： *Institutes Concerning Divine and Human Readings* ) 為修道院藏書奠定了基調。這部作品不僅涉及寫本的抄寫和管理，而且還提出藏書和選購的標準，因而成為修道院圖書館必備典籍之一。<sup>53</sup> 之後湧現的《本尼迪克特清規》( 拉： *Regula Benedicti* , 英： *Rule of Saint Benedict* , 又稱《本篤會規》 ) 也認為圖書館文獻必須博採眾長。《本篤會規》是天主教修士聖本尼狄克特 ( *St. Benedict* 或 *Benedict of Nursia* , 480–543 年，又稱

51 George W. Houston, *Inside Roman Libraries: Book Collections and Their Management in Antiquity*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4), 2–3.

52 克拉克：《照管圖書》，頁 38。另一個書櫃的圖樣來自於佛羅倫薩的《阿米婭提努斯鈔本》( *Codex Amiatinus* )。值得注意的是，用於描述羅馬書籍和圖書館的各種拉丁文術語在中世紀的圖書館中也延續了下來，比如卷軸 ( *volumna* )、軸棍 ( *umbilicus* )、握柄 ( *cornua* )、書盒 ( *capsa* )、書架 ( *pegma* ) 以及書櫃 ( *armarium* ) 等名詞。

53 P. G. Walsh, *Cassiodorus, Explanation of the Psalms* (Westminster: Newman Press, 1990–1991); 史靜寰、李淑華主編：《外國教育思想通史——中古時期的教育思想》(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三卷，頁 115–119；馬家偉、楊曉莉、姜洋主編：《圖書館與圖書館學概論》(長春：吉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6 年)，頁 298–306。

聖本篤)為了規範卡西諾山修道院(Monastery at Monte Cassino, 529年創建)的靈修生活而設立的院規。卡西諾山修道院位於羅馬西北,到了八世紀後半葉一舉躍升為天主教的學術中心,聚集了諸多珍貴的抄本。《本篤會規》提出修道院(或隱修會院)是一所學校(拉:schola),因此倡導隱修士進行神聖的閱讀(拉:lectio divina)並詠唱聖典。會規第48章《論每日的手工勞作》(拉:De opera manuum cotidiano)以及其他有關閱讀和聖詠的章節都提供了圖書館的間接線索,後來基於會規而建立的「本篤圖書館」(Benedictine Libraries)也應運而生。<sup>54</sup>此後,部分的西方教團也效仿聖本篤而在各自的會規中羅列出圖書管理和閱讀的條例。有條件的修道院圖書館還將藏書分為神學和世俗性書籍兩個部分。宗教書籍的收藏順序是:聖經、教父學著作,聖傳、以及注釋書等等。稍具規模的基督教修道院內一般都設有繕寫室(scriptorium,又稱抄寫室),受過教育的僧侶可以在此從事抄寫工作。常用圖書,如做禮拜所需的經文,常常和禮儀用的服飾以及宗教器物放在一起。修道院的典籍如果數量不多通常會放置在半圓形的壁龕之中,如果收藏的手稿眾多就會設立一個圖書室(book room)。

基督教圖書館的手稿可以利用羅馬的交通路網進行流通。這些便利的道路體系構成天然的絲路商道,主要分為公共大道(拉:Viae Publicae)、私人道路(拉:Viae Private)和鄉村小道(拉:Viae Vicinales)三種。在絲綢之路的巴爾幹和小亞細亞區域,利用希臘化時代的現成商道,羅馬人修建了連綴成片的大道和分支路網,除了書籍貿易,基督徒和旅行者也可以沿着這些道路展開朝聖之旅,傳播修道院的見聞和圖書館軼事。知名的圖書館,如帕加馬

54 代表基督教隱修運動的《本篤會規》為歐洲的修道生活(monasticism)奠定了基調,參看王凱:《西歐中世紀修道院教育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57-58;蜜雪兒·普契卡(Michaela Puzicha)著,杜海龍譯:《本篤會規評注》上下冊(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5年),頁5-20。更早一些,四世紀的《帕科米烏會規》(The Rule of Pachomius)也提出了照管手稿和閱讀的重要性,參看 Armand Veilleux, *Pachomian Chronicles and Rules* (Mich.: Cistercian Publications, 1981), 149、162、182。

圖書館、行省首府的神廟圖書館（如安條克）、都分布在羅馬大道的重要節點上。<sup>55</sup> 當然在羅馬絲綢之路的疆界以西，也就是西歐和北歐地區，修道院圖書館的例證不勝枚舉，但是因為和主題無關，此處就不再一一贅述了。<sup>56</sup>

在西羅馬帝國陷入危機之後，康斯坦丁大帝創立的拜占庭帝國（Byzantine Empire，285–1453年）在黑海以南延續了對亞洲絲綢之路的統治。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1902–1985年）在《菲力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法：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英：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中提到，直到十四世紀遠在地中海航道末端的黑海都是公認的絲綢之路的實際終點。坐落於黑海南部的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又名拜占庭）扼守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orus Strait），是絲綢之路西端通往羅馬的門戶。<sup>57</sup> 作為希臘的前殖民地，這座東方的新羅馬（拉： *nova Roma*）崇尚希臘文化，這一特點也影響了拜占庭的宗教圖書館。擁有古典光環的君士

55 有一些古老的路線圖（拉： *itineraria*）、地圖和旅程彙編可資利用，如《波伊廷格地圖》（拉： *Tabula Peutingeriana*）、《博廷格圖拉》（ *tabula Peutingeriana*）、《安東尼行省道路圖》（拉： *Itinerarium Provinciarum Antonini*）、《皇帝安敦尼·奧古斯都海路圖》（拉： *Imperatoris Antonini Augusti itinerarium maritimum*）、《耶路撒冷（或波爾多）路線圖》（拉： *Itinerarium Burdigalense sive Hierosolymitanum*）以及《艾特里婭朝聖》（拉： *Peregrinatio Aetherae*）等等。有關羅馬的道路，參看《古代羅馬社會生活》，頁 223–227；威特基：《古代世界歷史地圖集》，頁 194–199。

56 例如，597年建立的英國的坎特伯雷（Canterbury）修道院圖書館；660年建立的科爾比（Corbie）修道院圖書館和681年建立的賈羅（Jarrow）修道院圖書館；719年創立的瑞士聖加侖（St. Gallen）修道院圖書館（藏書量約300冊）；724年建立的德國的賴赫瑙（Reichenau）修道院圖書館（藏書量約413冊）、744年建立的富爾達（Fulda）修道院圖書館和822年建立的科爾維（Corvey）修道院圖書館。此外，法國的呂克瑟伊（Luxeuil）；德國的維爾茨堡（Würzburg）以及薩爾茨堡（Salzburg）等地也都以修道院圖書館而聞名。參看楊威理：《西方圖書館史》，頁 57–68；克拉克：《照管圖書》，頁 94–95。有關羅馬國境內的天主教圖書館的概況，參看 Johannes Duft, *The Abbey Library of Saint Gall* (St. Gallen: Verlag am Klosterhof, 1990); Michael H. Harris, *History of Libraries in the Western World* (Metuchen, N.J.: Scarecrow Press, 1999), 89–95; K. Staikos, *The History of the Librar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From Cassiodorus to Furnival* (Athens: Oak Knoll Press, 2010).

57 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著，唐家龍等譯：《菲力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一卷，頁 151。

坦丁堡是歐洲文化中心的另一顆新星，相對於西羅馬天主教的拉丁傳統，國都君士坦丁堡和各大行省的修道院不僅設立了東正教（Eastern Orthodoxy）的神學圖書館，而且也扮演着希臘學術中心的角色。<sup>58</sup>

毋庸置疑，君士坦丁堡的圖書館擁有帝國最好的宗教收藏。拜占庭的第五位皇帝伊索里亞的利奧三世（Leo III the Isaurian，680–741年；717–741年在位）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收集和保存基督教圖書的皇宮圖書館（Palace Library），該館入藏了大約7000卷紙草文書。其他的一些拜占庭君主，如「亞美尼亞人利奧」（Leo the Armenian，755–820年；813–820年在位）以及「紫衣貴族」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os，905–959年；913–959年在位），也都採納了從修道院圖書館中搜尋文獻來充實皇家館藏的做法，君士坦丁七世還主張皇家圖書館應當以亞歷山大圖書館為標杆，廣泛地收集國境以內的一切圖書和手稿。

除了皇家圖書館，君士坦丁堡還有引以為豪的大學圖書館、主教圖書館（Patriarchal Libraries）以及修道院圖書館。公元七世紀，在東正教的牧首塞爾吉烏斯（Sergius，610–638年）的主導之下，位於拜占庭的主教學院（Patriarchal Academy）興建了圖書館。另有證據指向一座名為聖索菲亞主教圖書館（Patriarchal Library at St. Sophia）的建築，拜占庭的哲學家西瑞爾（Cyril，827–869年）曾經擔任過這座圖書館的館長。<sup>59</sup>當然，君士坦丁堡保存基督教文獻的主要場所是東正教的修道院，正是依靠修道院圖書館，大量教

58 拜占庭圖書館的概況，參看 Nigel Wilson, "The Libraries of the Byzantine World," *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8 (1967), 53–80; Alexander Kazhdan and Robert Browning, "Library," in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vol. 2, ed. Alexander Kazhdan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224; K. Staikos, *The History of the Librar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 Byzantine World* (Athens: Oak Knoll Press, 2007).

59 William M. Johnston, *Encyclopedia of Monasticism* (London: Fitzroy Dearborn, 2000), 758. 牧首塞爾吉烏斯的史實，參看 A. A. 瓦西列夫 (A. A. Vasiliev) 著，徐家玲譯：《拜占庭帝國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頁346–347。



會手稿和古典文獻得以保存至今。<sup>60</sup> 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Flavius Anicius Justinianus，483–565年；527–565年在位）下令編撰的《查士丁尼法典》（拉：Codex Justinianus，英：The Code of Justinian）也沒有忽視東正教的修道生活，法典的條文鼓勵在修道院中收藏書籍（Nov. 133. 2），這證明在查士丁尼統治時期，東正教修士也需要閱讀和研習經典。<sup>61</sup>

在君士坦丁堡之外，查士丁尼大帝還下令修建了為數眾多的修道院。從拜占庭到絲路重鎮安條克必須穿越安納托利亞（Anatolia，相當於舊時的小亞細亞）。安納托利亞境內能夠行商的城市並不多，根據阿拉伯地理學家觀察，在九世紀期間，君士坦丁堡和敘利亞之間只存在五座城市：以弗所（Ephesus）、尼西亞（Nicaea）、阿摩利阿姆（Amorium）、安庫拉（Ancyra，或安卡拉 Ankara）和薩馬拉（Samala）<sup>62</sup> 由於現有文獻對絲綢之路在地中海地區的走向語焉不詳，加之絲綢之路本就是一個十九世紀才產生的概念，我們很難釐清東正教圖書館在絲路西段上的確切分布。不過宗教圖書館通常都位於商道近旁的城鎮之中，儘管早期的基督教強調避世的沙漠氣質，一部分修道院依然在行省首府，如希臘北部的塞薩洛尼基（Thessaloniki），或者商路節點上選址興建，畢竟依託於城市更加便於收集圖書或揀選精良的版本。小亞細亞的名城以弗所和艾德薩（Edessa，今土耳其南部的烏爾法 [Urfa]），都曾經是基督教的學術中心，擁有收藏豐富的圖書館。利用其館藏，艾德薩神學院（Theological School of Edessa）在五世紀有關基督一性

60 拜占庭帝國的修道院圖書館，參見 Carl Wendel, *Kleine Schriften Zum Antiken Buch-Und Bibliothekswesen* (Köln: Greven, 1974), 184–86; B. L. Fonkitch, “La bibliothèque de la grande Lavra du Mon-Athos aux Xe-XIIIe siècles,” *Palestinskij Sbornik* 80 (1967): 167–75.

61 Johnston, *Encyclopedia of Monasticism*, 759. 《查士丁尼法典》中曾多次提到修道院的規範，參看 Bruce W. Frier, *The Codex of Justinian: A New Annotated Translation with Parallel Latin and Greek Tex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81–139。

62 撒母耳·芬納（Samuel Finer）著，王震譯：《統治史（卷二）：中世紀的帝國統治和代議制的興起——從拜占庭到威尼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15–21。

論（Monophysism）的論辯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再往東就是絲路名城安條克，安條克在羅馬帝國時代以神廟圖書館聞名，後來也成為基督教圖書館重鎮。此外，東正教圖書館也分布在拜占庭的聖山之中，這其中比較知名的幾座是：意大利南部的洛薩諾（Rossano）聖山圖書館；希臘東北愛琴海中的阿索斯山（Mount Athos）圖書館；<sup>63</sup> 馬其頓東部的普羅德羅莫斯修道院（Monastery of St. John Prodromos）圖書館以及黑海之濱的拉布宗修道院（Monastery of Trebizond）圖書館等。<sup>64</sup>

除了縱貫小亞細亞和黎凡特的羅馬大道，另有一條朝聖之路（Pilgrim Road）連接了拜占庭和耶路撒冷。這條道路從君士坦丁堡出發，經由安庫拉、塔爾蘇斯（Tarsus）和安條克，連接了小亞細亞的修道院和巴勒斯坦的聖城，這條道路在古典時代的晚期尤為重要。如果將這條道路從耶路撒冷延伸到亞歷山大，就基本構成了完整的黎凡特絲綢之路，其走向上也和平行的東地中海貿易航道大致相同。<sup>65</sup> 黎凡特中南部的名城，如羅馬巴勒斯坦的首府凱撒利亞（Caesarea，今屬以色列）；西奈半島的聖山摩西山（Mountain of Moses）；羅馬努米底亞（Numidia）的首府西爾塔（Cirta，今屬阿爾及利亞）；當然也包括絲路要衝耶路撒冷和亞歷山大，都擁有知名的宗教圖書館。在羅馬政治語境中的「東方」（拉：praefectura praetorio Orientis，簡稱 Oriens）地區，凱撒利亞是關鍵的港口城市，基督教徒在此創建了著名的凱撒利亞圖書館（Library of

63 例如，有關阿索斯山菲洛修修道院（Philotheou Monastery）圖書館的研究，參看 Anthony Bryer and Mary Cunningham, *Mount Athos and Byzantine Monasticism: Papers from the Twenty-Eighth Spring Symposium of Byzantine Studies, Birmingham, March 1994* (Aldershot, Great Britain; Brookfield, Vt., USA: Variorum, 1996), 135–54.

64 以拜占庭歐洲區的宗教圖書館為中心，傳教士（如聖西瑞爾 St. Cyril）將東正教的圖書文化介紹到東歐、高加索和俄羅斯南部地區，所以從東歐一直到基輔羅斯（Kievan Rus），都屬於拜占庭修道院的圖書文化圈。

65 威特基：《古代世界歷史地圖集》，頁 197–198。黎凡特兩條平行的陸地和海上貿易通道，參看 Karen Manchester and James B. Cuno, *The Silk Road and Beyond: Travel, Trade, and Transformation* (Chicago: New Haven: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7.

Caesarea)，據說藏書多達三萬冊。<sup>66</sup>

無論是聖山修道院還是絲路節點的城鎮，都是收藏拜占庭宗教文獻的上佳之地，有些珍貴手稿籍由山谷中的隱修院而保存至今。比如最早的希臘語《聖經》譯本——西奈山寫本（又名「西奈抄本」，拉：Codex Sinaiticus）——就是十九世紀在西奈山腳的聖凱薩琳修道院（Saint Catherine's Monastery）中發現的。該修道院建於六世紀的查士丁尼時代，是世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圖書館。<sup>67</sup>此外，著名的靈知派（Gnosticism）文獻「拿戈·哈瑪第圖書館」（Nag Hammadi Library 或 Nag Hammadi Codices，四世紀）也是在羅馬埃及行省的派克米烏修道院（Pachomian Monastery）出土的。從 1945 開始，這批被稱為「靈知派福音書」（Gnostic Gospels）的古抄本陸續在埃及城鎮拿戈·哈瑪第問世，和敦煌遺書或貝格拉姆寶藏（Begram Hoard）一樣，這些使用紙莎草紙抄寫的文書是被刻意埋藏起來的。<sup>68</sup>1952 年，在距離拿戈·哈瑪第不遠的地方，還發現了「博多默爾紙草書」（Bodmer Papyri），這些基督教文獻同樣來自於一所隸屬於

66 古代巴勒斯坦的港口城市，後來變成羅馬猶太行省（Kingdom of Judea）的首府。此地的圖書館，參看 Anthony Grafton and Megan Hale Williams, *Christiani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ook: Origen, Eusebius, and the Library of Caesarea*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21.

67 理查德·弗羅因德（Richard A. Freund）著，屈伯文、方舟譯：《跟著聖經去考古》（上海：上海三聯出版社，2017 年），頁 91。有關西奈山抄本的研究，還可參看 Frederick Scrivener, *A Full Collation of the Codex Sinaiticus with the Received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Cambridge, London: Deighton, Bell Bell and Daldy, 1864); Fritz Henning Baader and H. J. Grieser, *Codex Sinaiticus Als Grundtextausgabe Der Geschriebenen Des Neuen Bundes* (Schömburg: F.H. Baader: H.-J. Grieser, 1993); D. C. Parker, *Codex Sinaiticus: The Story of the World's Oldest Bible* (London Peabody, Mass: British Library; Hendrickson, 2010).

68 參看 James Robinson, ed. *The Nag Hammadi Library in English*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8); James Robinson and Institute for Antiquity and Christianity, *The Coptic Gnostic Library: A Complete Edition of the Nag Hammadi Codices*, vols.5 (Leiden;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 2000); Marvin W Meyer, *The Gnostic Discoveries: The Impact of the Nag Hammadi Librar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5); Marvin Meyer and Coptic Gnostic Library Project, *The Nag Hammadi Scriptures* (New York: HarperOne, 2007); 羅賓遜（James M. Robinson）、史密斯（Richard Smith）編，楊克勤譯：《靈知派經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

派克米烏教團（Pachomian Order）的修道院。<sup>69</sup> 目前研究絲綢之路的學者多關注西域所發現的靈知派文獻（大多為摩尼教文本），在絲路北非段的埃及和絲路中亞段的新疆之間是否存在其他的靈知派圖書館，還留待進一步梳理。

如上所述，分布於東西羅馬境內的修道院將拉丁語系的宗教藏書和君士坦丁堡、安條克、耶路撒冷、以及亞歷山大的希臘語系的宗教圖書館連綴成地中海的圖書絲綢之路。不過圖書館史的學者還是指出，由於古典文化在基督教的強權之下趨於沒落，後期的羅馬圖書館較之以前的多神教圖書館反而有些許的退步。儘管如此，羅馬的基督教圖書館在古代藏書和新興的大學圖書館之間發揮了承前啟後的作用。正如中世紀流行的拉丁文諺語所說：「沒有圖書館的修道院，就像沒有武器的堡壘」（拉：Claustrum sine armario quasi castrum sine armentario）。修道院的圖書館雖小，卻不可或缺，正是修士的神學圖書室孕育了早期的大學圖書館。<sup>70</sup> 如果放眼更為遼闊的東方，也就是和希臘—羅馬世界相對的西亞乃至亞洲腹地，我們會發現基督教已經在六世紀的一些亞洲城市嶄露頭角，如巴士拉（Basra）、巴格達（Bagdad）和摩蘇爾，甚至連遙遠的斯里蘭卡也設立了教區，與此同時，基督教的異端景教（Nestorianism）的文獻也出現在遙遠的漢唐西域。<sup>71</sup> 雖然考古發掘中湧現的證據值得審視，但是西方的宗教圖書館究竟對西亞乃至中亞的圖書文化有多少直接的影響，還有待細緻考證。

#### 四、開羅到木鹿：絲路波斯段的伊斯蘭圖書館

二世紀的「羅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前 27– 公元 180

69 James M. Robinson, *The Story of the Bodmer Papyri From the First Monastery's Library in Upper Egypt to Geneva and Dublin* (Cambridge: James Clarke, 2011), 130–45.

70 William Smith and Samuel Cheetham, *A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Antiquities*, vols.2 (Hartford: The J. B. Burr Publishing Company, 1875–1880), 985–88.

71 彼得·弗蘭科潘（Peter Frankopan）著，邵旭東、孫芳譯：《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 47。

年)代表了羅馬統治的極盛期。此時帝國的疆域東達小亞細亞的西里西亞(Cilicia)和中東的敘利亞,羅馬境外的東北是亞美尼亞(Armenia),東南是中央歐亞(Central Eurasia)的波斯王朝帕提亞(Parthia,又稱安息,前250–公元226年)。<sup>72</sup>這條東域的邊界一直維持到拜占庭時期,唯一不同的是羅馬的大敵變成了薩珊波斯(Sassanian Persia,226–651年)。至此,我們來到了橫亙在西方絲路和中亞絲路之間的最後一塊疆域——羅馬以西的波斯。鑑於波斯時期圖書館的資料稀少,而且絲路西亞段也缺乏研究,本文只能概述波斯絲綢之路和七世紀之前的波斯圖書館,然後再將重點放在西亞絲路沿線的伊斯蘭教圖書館。<sup>73</sup>

在阿拉伯的征服之前,波斯諸帝國的輝煌歷史延續了1200年。在絲綢之路的視野之中,西亞絲路的根基是波斯帝國經營了數百年的皇家大道。前331年,亞歷山大的希臘聯軍就穿過巴比倫和蘇薩之間的西塔塞(Sittacene),踏入了波斯的商道,經過三年的征戰,大軍橫穿了阿契美尼德帝國(Achaemenid Empire,前550–前331年),直抵波斯邊境的「印度高加索」(Indian Caucasus),也就是險峻的興都庫什山脈(Hindu Kush)以及南部的印度河流域。<sup>74</sup>希臘聯軍在張騫出使中亞之前的200年就完成了這一壯舉,加上波斯帝國在東西兩端的擴張,完全可以視之為鑿通西方絲路的先導。亞歷山大推行的希臘化進程和中亞的佛教以及印度教發生了碰撞,此後,猶太教、基督教、拜火教、摩尼教、各種神秘主義信仰以及

72 絲路最西段和中亞段之間的陸路商道並非暢通無阻,兩地之間最主要的障礙是波斯的安息。東漢永元九年(97年),都護班超(32–102年)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甘英取道伊朗北道,經過要衝阿蠻國(哈馬丹 Hamadan),但由於安息從中阻撓,最終只能止步於條支(伊拉克)。饒宗頤教授在《由出土銀器論中國與波斯、大秦早期之交通》一文中曾經羅列漢地與大秦交往的18條記錄並加以決疑,他也認為「大秦通漢,屢為安息所阻擋」,參看饒宗頤:《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中外關係史》(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10冊,頁173–180。

73 有關波斯圖書館的零星綫索,參看 Ernst Herzfeld, “Einige Bücherschätze in Persien,” *Ephemerides Orientales*, no. 28 (1926): 1–8.

74 歐姆斯特德(Olmsted)著,李鐵匠、顧國梅譯:《波斯帝國史》(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頁626;保羅·卡特利奇(Paul Cartledge)著,曾德華譯:《亞歷山大大帝——尋找新的歷史》(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頁147–164。

它們的教籍也通過波斯的禦道傳到中央歐亞。

這條希羅多德筆下的皇家大道從小亞細亞西陲的文化中心薩迪斯（Sardis）一直延伸到埃蘭人（Elamite）的舊都蘇薩（Susa），全程約 2400 到 2600 公里。<sup>75</sup> 這條驛道途經一系列王朝的首都、省府和綠洲通衙、如交通要衝赫拉特（Herat）、米提亞人（Medes）的舊首都埃克巴坦那（Ecbatana，或 Hamadan）、波斯的都城波賽波里斯（Persepolis）、帕薩迦迪（Pasargadae）以及大不里士（Tabriz）等要衝。<sup>76</sup> 除了波斯大道，西亞絲綢之路的版圖上還有數條並行的商路和支線，道路的名稱也隨着王朝的更迭而變換，如「伊朗北道」和「伊朗南道」等。<sup>77</sup> 經過一番開疆拓土，波斯的邊界早已超越禦道的終點蘇薩，佛教的聖地塔克西拉（Taxila，今屬巴基斯坦）也一度隸屬於阿契美尼德王朝。<sup>78</sup> 為了便於討論，我們姑且以中亞和西亞交界處的樞紐木鹿（Merv 或 Marv，今土庫曼斯坦的梅夫）為絲路波斯段的邊界。從木鹿西行經由數條幹線和支路可以穿越伊朗高原到達巴格達，由木鹿東進穿過中亞的山谷可以直抵西域絲路的起點喀什葛爾（Kashgar）。<sup>79</sup>

波斯文學史通常對七世紀以前用阿維斯塔語（Avesta）或巴列維語（Phalavi）寫就的古代典籍一筆帶過，一份出自天主教修道院圖書館的敘利亞文手稿《胡齊斯坦編年史》（*The Chronicle of*

75 查理斯·辛格（Chales Singer）主編，潛偉主譯：《技術史第 2 卷——地中海文明至中世紀（約前 700 年至約前 1500 年）》（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 年），頁 352–353。

76 赫拉特就是希臘化時期的亞歷山大·阿里安（Alexandra Ariana）。從赫拉特出發通往其他絲路要衝的商道，參看 George Bruce Malleon, *Herat: The Granary and Garden of Central Asia* (London: W.H. Allen & co, 1880). 除了波賽波里斯和帕薩迦迪，埃克巴坦那、巴比倫以及蘇撒都曾為波斯帝國的首都。

77 有關這兩條道路的研究，參看中華文化通志編委會編：《中國與西亞非洲文化交流志》，收入《中華文化通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95 冊，頁 240—241。

78 威特基：《古代世界歷史地圖集》，頁 87。

79 雍際春：《絲綢之路歷史沿革》（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 年），頁 144。Merv 在《後漢書》和《新唐書》中均作木鹿，《隋書》稱之為穆國，是從波斯進入中亞河中地區（Transoxiana）的重要通道。

*Khuzistan*) 告訴我們，七世紀的薩珊波斯曾經佔領埃及，當他們攻陷亞歷山大城的時候，也自然奪取了帶有希臘遺風的城市圖書館。<sup>80</sup> 繼而我們從阿拉伯人的記載中隱約得知，哈里發會下令在波斯圖書館（波：ketabkhane）中尋找書籍，然後將它們運往伊斯蘭的皇家圖書館。<sup>81</sup> 伊斯蘭化之前的波斯宗教圖書館主要是指拜火教（祆教）和摩尼教在西亞境內的圖書館，可是對於兩者我們都所知甚少。拜火教曾經是波斯國教，時至今日，沿着古代的「伊朗北道」旅行還能找到拜火教的寺院（祆祠）。<sup>82</sup> 270年，薩珊波斯的疆域達到極致，此時波斯境內的祆祠大多集中在伊朗高原的西部和南部地區。<sup>83</sup> 此後祆教和摩尼教都沿着伊朗禦道傳到木鹿和粟特河中地區。到了八世紀，據唐杜環《經行記》記載，在木鹿以西的撒馬爾罕城內也能找到祆祠。<sup>84</sup> 考慮到巴基斯坦的佛教遺址塔克特依巴依（Takht-i-Bahi）的前身也是一座祆教寺院，我們推測祆教圖書館在絲路的西亞和中亞段沿線並不少見。同樣，源於波斯的世界性宗教摩尼教也趁機沿着絲綢之路擴張，有些新的教派——如「電那勿派」（Denawars）——已經脫離了巴格達的總壇而在中亞的阿姆河（Amu Darya River）流域設立教區。沿着絲路繼續東行來到新疆，吐峪溝摩尼教

80 Nasir al-Ka'bi, *A Short Chronicle on the End of the Sasanian Empire and Early Islam*, 590–660 A.D (Piscataway: Gorgias Press, 2016), 52–55. 這部修道院收藏的編年史文獻其實是由 17 部摺紮在一起的短篇手稿組成的，參看 Jacques Vosté, *Catalogue de la bibliothèque syro-chaldéenne du Couvent de Notre-Dame des semences près d'Alqoš (Iraq)* (Rome: Bureau de l'Angelicum, 1929), 63–66.

81 早期波斯圖書館中可能收藏的古典作品，參看張鴻年：《波斯文學史》（北京：昆侖出版社，2004年），頁 7–17。在波斯語中，代表圖書館或者書屋的詞彙還有 kotobkhâne、dâr-al-ketâb、beyt-al-kotob、khezânat-al-kotob 等等，參看 Iraj Afshar, “Libraries and Librarianship,” in *A History of Persian Literature. Vol. I: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ersian Literature*, ed. J. T. P. de Bruijn and Ehsan Yarshater (London: I. B. Tauris, 2009), 447–74.

82 參看松田壽男（Matsuda Hisao）著，金曉宇譯：《絲綢之路紀行》（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 176–180。

83 威特基：《古代世界歷史地圖集》，頁 217。

84 杜環著、張一純箋注：《經行記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 8。杜環，京兆萬年人，是唐朝宰相杜佑（735–812年）的族子，他的《經行記》是最早有關於伊斯蘭教和絲路西亞段的漢文記錄。

寺院中出土的大量摩尼教文獻也表明，至少有兩所寺院擁有教會裡級別較高的藏書室。<sup>85</sup> 由此類推，摩尼教的寺院圖書館在更為靠近教廷巴格達的波斯絲路上應當數量更多，而且中亞的佛教圖書館由於和祆祠以及摩尼教寺院同處一地，相互的碰撞和影響也是在所難免。

伊斯蘭的東擴最終改變了西亞絲路的面貌。七到八世紀之間，阿拉伯人迅速佔領了從黎凡特到中亞之間的絲綢之路。636 年之後，倭馬亞王朝（Umayyad Caliphate，又稱白衣大食，661–750 年）的大軍不斷逼近薩珊王朝的首府泰西封（Ctesiphon）。638、641 和 643 年，穆斯林一路勢如破竹，奪取了耶路撒冷、摩蘇爾和伊斯法罕（Isfahan）；651 年絲路要衝內沙布兒（Nishapur）和木鹿接連陷落；伊斯蘭軍隊不久便揮旆向東進入中亞，並於 664 年攻克喀布爾；最終在 709 年和 712 年分別佔領了絲路名城布哈拉和撒馬爾罕。<sup>86</sup> 此後餘下的中亞城市被逐一征服，甚至來自品治肯特（Penjikent）的粟特之王也在國人面前被穆斯林釘上了十字架。<sup>87</sup> 至此，阿拉伯人的軍隊已經逼近中國的邊境。751 年（唐天寶十年），唐軍和阿拉伯軍隊在中亞的怛羅斯（又稱塔拉斯 Talas，今屬吉爾吉斯斯坦）交鋒，臨近的怛羅斯河正好和絲綢之路相交匯。此役高仙芝（755 年卒）率領的唐軍兵敗，據說中國的造紙術在此後傳到撒馬爾罕，《世界境域志》（阿：*Hudud al-alam*，英：*Regions of the World*）的波斯作者也說此地的摩尼教寺院專事製紙並出口到四方。隨後巴格達在 794 年也建立了造紙作坊，這一機構還逐漸演變成當

85 Ibn al-Nadīm, Muhammad ibn Ishāq, and Bayard Dodge, *The Fihrist of Al-Nadīm; a Tenth-Century Survey of Muslim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792; 王媛媛：《從波斯到中國——摩尼教在中亞和中國的傳播》（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頁 22–24、230–235。

86 21 世紀研究會編，李尚霖譯：《伊斯蘭的世界地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4 年），頁 13。

87 弗蘭科潘：《絲綢之路》，頁 79。



時三大伊斯蘭圖書館之一。<sup>88</sup> 塔拉斯一役後，杜環為大食人俘虜，他隨後穿越了中央歐亞的絲綢之路，經由粟特（Sogdiana）、撒馬爾罕、布哈拉等地、到達中亞絲路的邊陲末祿國（木鹿）。從這裡開始，杜環沿着亞歷山大的足跡，由「伊朗北道」西行，遍遊西亞絲路的重鎮內沙布林、哈馬丹等地，最終抵達阿拔斯王朝（Abbasid Caliphate, 750–1258 年）的首府亞俱羅（又稱庫法 [Kufa]）。儘管某些波斯史籍指出哈馬丹的清真寺圖書館不僅收藏書籍，還無限量地提供紙筆，但是《經行記》中卻沒有留下相關記載。其實在杜環的時代，敦煌絲路上的商人已經在用紙寫信並寄向撒馬爾罕，而同時沿着絲路來到長安和揚州等地的阿拉伯族裔已經有數千人，由此可見，八世紀中阿之間的書籍交流已經開闢了渠道。

伊斯蘭帝國擴張到裏海東南岸之後，波斯絲綢之路的幹線除了古時的御道和伊朗南北兩道，還增添了阿拉伯人眼中的「呼羅珊大道」（Khorasan Road），這是一條東起巴格達而西至撒馬爾罕的環形商路。阿拉伯地理學名作《道里邦國志》（阿：*Kitāb al-Masālik wa'l-Mamālik*，英：*The Book of Roads and Kingdoms*）為我們描述了九世紀中期「大呼羅珊路」的確切走向。作者伊本·胡爾達茲比赫（Ibn Khordādhbeh, 820–912 年）原為祆教徒，後信奉伊斯蘭並擔任阿拔斯王朝的郵政長官。他在書中指出，這條絲路通衢從巴格達出發，一直延續到中亞和北印度，其間有多處分叉，要經過設拉子（Shiraz）、巴爾赫（Balkh）、埃克巴坦那、內沙布爾、木鹿、布哈拉、撒馬爾罕、鐵門（Iron Gate）以及費爾幹納（Fergana）等

88 陳大川：〈怛羅斯之戰與撒馬爾罕紙〉，《中國造紙學會第十二屆學術年會》，2005 年，頁 22–32；佚名著，王治來譯：《世界境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頁 108；馬丁·里昂斯（Martyn Lyons）著，龔橙譯：《書的歷史——西方視野下文化載體的演化與變遷》（北京：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2017 年），頁 49；羅新：〈撒馬爾罕紙〉，《讀書》2020 年第 3 期，頁 152–161，當然周一良（1913–2001）等學者也討論過這個問題，在此就不一一列舉了。紙張在伊斯蘭世界的傳播詳情，參看 Jonathan Bloom, *Paper before Print: The History and Impact of Paper in the Islamic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42–89.

歷史名城。<sup>89</sup>

在梳理西亞絲路的走向之後，本文的視角需要轉向絲路城市中的穆斯林圖書館，雖然伊斯蘭書籍的世界對我們並不陌生，但是仍然罕有學者將西亞絲路和伊斯蘭圖書館放在一起研究。從麥加到白沙瓦（Peshawar），伊斯蘭的新知被當作一種信仰來傳播，這是一種以《古蘭經》手稿（阿：masahif）和解經學為核心的宗教，穆斯林不僅認為書籍應該為讀者所用，而且也對誦讀《聖經》的基督徒和猶太教徒另眼相看，並稱之為「有經之人」（people of the book）。阿拉伯哈里發的皇家圖書館並不專藏回教書籍，他們也熱衷於搜集和翻譯各國的圖書，並將它們抄寫在紙莎草紙、羊皮紙或白楊樹皮之上。<sup>90</sup> 在《一千零一夜》（阿：kitāb 'alf layla wa-layla，英：Arabian Nights）中提到的阿拔斯王朝的第五代君主哈倫·阿爾·拉希德（Hārūn al-Rashid，763–809年；786–809年在位）就以酷愛書籍聞名，他的圖書館中塞滿了因征伐得來的波斯和希臘圖書。最早的《一千零一夜》文本不僅首先抄寫在紙上流通，而且還融合了波斯、阿拉伯乃至印度文學的諸多因素，這些都印證了穆斯林圖書館的多樣化收藏以及書籍的交融。<sup>91</sup>

阿拉伯史籍中說：「為求真知，不惜遠遊中國。」<sup>92</sup> 在伊斯蘭的絲綢大道上，所有重要的城市和學術中心，從開羅、哈蘭（Harran）、大馬士革、巴格達、巴士拉、君迪沙浦爾（Jundishapur）

89 胡爾達茲比赫（Ibn Khordādhbeh），宋峴譯：《道里邦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20–56。呼羅珊道的地圖，參看 Anita Ganeri and Paola Ravaglia, *The Atlas of World Religions*. (Columbus OH: P. Bedrick Books, 2002), map 22；呼羅珊大道的五段不同線路，參看趙汝清：《從亞洲腹地到歐洲——絲路西段歷史研究》，頁236；Hamidreza Pasha Zanous and Juping Yang, “Arsacid Cities in the Hanshu and Houhanshu,” *Iran & the Caucasus* 22, no. 2 (2018): 123–38；Rocco Rante, *Greater Khorasan: History, Geography, Archaeology and Material Cultur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15), 51–61.

90 勒納：《圖書館的故事》，頁76；Mostafa Vaziri, *Buddhism in Iran: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Traces and Influenc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xix–xx.

91 納訓譯：《一千零一夜（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頁1–2。

92 楊威理：《西方圖書館史》，頁47。

到遙遠的木鹿、布哈拉、直至通往漢唐所必經的中亞腹地，不僅蘇菲學者（sufi）紛至沓來，而且各種穆斯林的圖書館也紛紛湧現。<sup>93</sup> 同時，寬容的穆斯林大方地為奔走於絲綢之路上的基督教異端提供了庇護。一性論派教徒（Monophysite）和聶斯脫利派（Nestorian）教徒紛紛避走波斯和中亞，有的甚至來到了中國。因此，在絲綢之路上羅列出的遺址名單中也會出現宗教圖書室的名稱。

簡而言之，位於絲綢之路沿線的穆斯林圖書館主要是清真寺圖書館和經學院圖書館，當然皇家圖書館和個人圖書館中也充斥着伊斯蘭的典籍。隨着阿拉伯人向中東挺進，新興的伊斯蘭圖書館都位於絲路名城的清真寺之中，如耶路撒冷的阿克薩清真寺（Al-Aqsa Mosque, al-Aqîṣa, 634年）、開羅的阿米爾清真寺（Mosque of Amr, 641年）和大馬士革的倭馬亞清真寺（Umayyad Mosque, 721年）。伊斯蘭六大聖訓（阿：Kutub al-Sittah）之一的《伊本·馬哲聖訓集》（阿：Sunan Ibn Mājah）指出求知是每一位穆斯林的職責，而且信眾來到聖寺的主要目的也是教授及學習知識，這些穆聖的訓示也暗示了清真寺優良的學風和圖書館的存在。<sup>94</sup> 在這些禮拜學堂中任職的書籍管理員（阿：sahib al-masahif）會通過鼓勵捐贈公產（瓦克夫，阿：waqf）等方式來籌建圖書館（阿：maktabah）或圖書室（阿：bait），同時清真寺也可吸納公家和私人圖書。正如「經」這個詞與經書的收藏機構有關，在阿拉伯語中，和「書」（kitab）有關的詞常常指向圖書館，除了最常用的 maktabah 和 bait，還有 khizana（書櫃）、dar（書庫）、khaza'in al-masahif（聖

93 伊斯蘭圖書館概況，參看 Youssef Eche, *Les bibliothèques arabes publiques et semi-publiques en Mésopotamie, en Syrie et en Egypte au Moyen-Age* (Damas: Institut français de Damas, 1967); George Atiyeh, *The Book in the Islamic World: The Written Word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Library of Congress, 1995).

94 伊本·馬哲（Ibn Mājah）輯錄，穆薩·余崇仁譯：《伊本·馬哲聖訓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頁23–24。Franz Rosenthal, *Knowledge Triumphant: The Concept of Knowledge in Medieval Islam*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 1970), 307.

典室)等。<sup>95</sup> 清真寺的收藏以《古蘭經》手稿和聖訓(hadith)為主體,不過館員同樣收集古典作品來充實館藏,有時在清真寺任教的學者也會捐贈書籍給圖書館,其他在清真寺中供職的專業館員還包括抄寫員、裝訂員和書籍裝幀工等。

另一種遍布於西亞和中亞絲路上的伊斯蘭圖書館是經學院(madrasa)的附屬圖書館。經學院的前身是開羅和菲斯(Fez)等地開設的清真寺宗教學院(阿:jawami),其功能類似於一所穆斯林大學。從1064年開始,塞爾柱帝國(Seljuq Empire, 1037–1194年)在中亞和西亞所向披靡,信仰遜尼派(Sunni)的塞爾柱突厥人逐漸在波斯和阿拉伯的絲綢之路上建立起以多所尼扎米亞大學(Nizamiyyah)為中心的學術網路,用來針對什葉派(Shi'ite)和伊斯瑪儀派(Ismailis)等異端,其中最負盛名的尼扎米亞大學位於巴格達,蘇菲哲學家安薩里(al-Ghazali, 1058–1111年)曾經在此執教,其他的絲路城市,如開羅、巴士拉、內沙布林、伊斯法罕和摩蘇爾等處也紛紛開設了這所經學院的分校。<sup>96</sup> 經學院的目標是培養神學家,所以附屬的圖書館儘管也收集世俗文獻,但是館藏規模比起早期的穆斯林圖書館似乎稍遜一籌。絲路名城內沙布爾除了數十所經學院圖書館,還有專門的聖訓圖書館(阿:Dar-al-Sonna)和阿齊爾清真寺(Aqil Mosque)圖書館,而後者的館藏多達5000部。同樣,除了收藏伊斯蘭教法的經學院圖書館,伊斯法罕的週五清真寺(Friday Mosque)外也建立了一座據說供訪客使用的圖書館。<sup>97</sup> 到了中亞地區,薩曼王朝(Samanid Empire, 819–999年)的經學院不僅為求學之士提供學費,而且還善於借鑑佛教寺院長於思辨的傳統。由於毗鄰佛教文化圈,波斯系的薩曼經學院據說也效仿佛教

95 有關清真寺的圖書館,參看 Johannes Pedersen and Robert Hillenbrand, *The Arabic Book*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113–30; Mohamed Makki Sibai, *Mosque Libraries: An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New York: Mansell, 1987).

96 顧明遠主編:《教育大辭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1冊,頁73–74; Ebrahim Moosa, “Madrassa,” *Encyclopedia of Islam and the Muslim World*, ed. Richard C. Martin, 2nd ed., vol. 2 (New York: Macmillan Reference, 2016), 671–76.

97 Iraj Afshar, “Libraries and Librarianship,” 447–49.

的經藏來建設圖書館。<sup>98</sup>

中世紀的穆斯林掌控了從開羅到布哈拉綿延數千里的絲綢之路，其範圍已經超越了波斯的禦道和馬其頓的國道。在本文中考索伊斯蘭絲路上的每一個節點並提供圖書館的線索顯然是不現實的，故以下我們將揀選絲路網路上部分有代表性的伊斯蘭名城，並概述其宗教藏書和圖書館。首先，絲路中東段的重要圖書中心有北非的開羅和西亞的巴格達。開羅除了靠近亞歷山大圖書館，也匯聚了各大宗教的藏書，因此開羅一直是非洲著名的圖書集散地。<sup>99</sup> 988年，法蒂瑪王朝（Fatimid Dynasty，909–1171年）的君主埃爾·阿奇茲（al-Aziz，955–996年；975–996年在位）興建了一座擁有十萬卷手稿的圖書館，其中包括2400卷飾以金銀的《古蘭經》。<sup>100</sup> 到了十一世紀（1004年），另一位哈里發哈克慕（al-Hakim，985–1021年；996–1021年在位）創辦了鼎鼎大名的「學問之家」（阿：Dar Al-‘Ilm），這是一所研討天文、醫學、神學和法學的綜合研究所，內部設有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同時，開羅的法蒂瑪王宮也以收藏驚人的40座書庫而著稱，總藏書量據說達到20萬冊。<sup>101</sup>

從開羅出發沿着東北方向的絲路，經過耶路撒冷、大馬士革、從古城帕爾米拉折向東，順着幼發拉底河前行，即可到達古都巴格達。巴格達舊稱和平之城（阿：Madīnat al-Salām 麥迪那·阿薩拉姆），預示着這裡的圖書兼收各家之長，除了伊斯蘭圖書館，祆教、摩尼教也紛紛在此設立壇口並收藏經書。阿拉伯人不僅翻譯希臘語和波斯語的作品，而且對印度的手稿也不乏興趣，早在七世紀，印度數學家婆羅門笈多（Brahmagupta，598–660年）就曾攜帶數學

98 弗蘭科潘：《絲綢之路》，頁91。

99 Graziano Krätli and Ghislaine Lydon, *The Trans-Saharan Book Trade: Manuscript Culture, Arabic Literacy,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Muslim Africa*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 2011), 1–34.

100 小野泰博：《圖書和圖書館史》，頁59。

101 艾哈邁德·愛敏（Ahmad Amin）著，納忠譯：《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5冊，頁187–188。

和天文學的梵文著作到訪巴格達。<sup>102</sup> 印度佛教作品也通過摩尼教傳入巴格達，並和其他印度著作一同被翻譯成波斯文，可見摩尼教圖書館中也兼顧佛教寫本。<sup>103</sup> 到了九世紀，阿拔斯王朝的哈里發麥蒙（al-Ma'mun，786–833 年；813–833 年在位）在巴格達建立了名為「智慧宮」（阿：Bayt al-Hikma 或 Khizana al-Hikma）的學術交流中心，吸引了絲路四方的學者（阿：al-ulema）和文人（阿：al-udaba）。智慧宮的館長是三位波斯學者，他們以亞歷山大圖書館為圭臬，派人遠赴拜占庭尋找手稿並設立書籍儲藏室，其目的是熔鑄伊斯蘭文化、希臘智慧與波斯學藝為一體。<sup>104</sup> 十世紀的巴格達在另一位哈里發穆克塔迪爾（al-Muqtadir，932 年卒；908–932 年在位）的統治之下再次成為國際圖書館的中心，歷史學家穆罕默德·阿爾·泰伯里（Muhannad al-Tabari，838–923 年）利用城中的圖書館撰寫了 150 卷的巨作《泰伯里歷史》（阿：Tarikh al-Tabari，英：The History of al-Tabari），據說他在寫作過程中參考了萬卷藏書，而他的這部名作也被伊斯蘭世界的多處圖書館所收藏。<sup>105</sup> 在巴格達城中，泰伯里的居所臨近呼羅珊大道的起點巴拉單橋（Baradan Bridge），中東的圖書正是沿着這條著名的商道向中亞傳播，東方的典籍也由此流入巴格達。<sup>106</sup> 巴格達的圖書盛況一直持續到蒙古入侵前夜，屆時全城已經有 36 座大型圖書館，很遺憾大部

102 Dimitri Gutas, *Greek Thought, Arabic Culture: The Graeco-Arabic Translation Movement in Baghdad and Early Abbāsīd Societ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103 辛加爾 (Singhal) 著，莊萬友譯：《印度與世界文明》（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年），下冊，頁 265。

104 Claude Gilliot, ed., *Education and Learning in the Early Islamic World* (Farnham, Surrey, Engl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Variorum, 2012), 308; 喬納森·萊昂斯 (Jonathan Lyons) 著，劉榜離、李潔、楊宏譯：《智慧宮——阿拉伯人如何改變了西方文明》（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年），頁 97。

105 Tabarī and Franz Rosenthal, *General Introduction and from the Creation to the Flood. The History of Al-Ṭabarī*, vol. 1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8), 141.

106 同上注，32; Ulrich Marzolph, *The Arabian Nights: An Encyclopedia* (Santa Barbara: ABC-CLIO, 2004), 486.

分的典籍都毀於絲路燃燒的戰火中。

離開巴格達的旅人會進入波斯的廣袤疆域，沿着伊朗南北兩道和呼羅珊道，伊斯蘭的圖書館星散四方，點綴着絲路的城鎮和綠洲，其中較為突出的手稿中心是南方的設拉子以及北方的木鹿和布哈拉。位於西亞絲路呼羅珊地區的設拉子是白葉王朝（Buyid Dynasty，932–1062年）的首府，以圖書館和書籍藝術而聞名於世。<sup>107</sup> 根據十世紀伊斯蘭學者阿爾·穆伽達西（al-Mukaddasi，945–988年）的記載，設拉子的一座私人圖書館建有儲藏室並提供完備的藏書目錄，所有的書籍被分門別類放在一人高的書架上。<sup>108</sup> 與設拉子相對的是位於中西亞分界點的絲路名城木鹿。阿拉伯史學家馬格里基（Al-Maqrizi，1364–1442年）在他的《埃及志》（阿：*Mawaiz wa al-'i'tibar bi dhikr al-khitat wa al-'athar*，法：*Description topographique et historique de l'Égypte*）中宣稱，木鹿清真寺的圖書館藏有薩珊王朝之後積累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典籍。<sup>109</sup> 絲路衰落之後，地理學家亞庫特·阿爾·哈馬威（Yakut al-Hamawi，1170–1220年）依然在木鹿的大清真寺和經學院之中發現了12座圖書館，據說讀者一次可以借出200本書。<sup>110</sup> 即使以二十一世紀大學圖書館的標準來衡量，這也是一個慷慨的數字。沿着木鹿的商道往東北進入河中地區，就來到了薩曼王朝的首都布哈拉。作為波斯人的伊斯蘭文化中心，布哈拉不僅繼承了波斯和阿拉伯的雙重遺產，而且還毗鄰經院哲學氛圍濃郁的佛教文化圈。在伊斯蘭征伐中亞的過程中，大量的佛寺連同寺院經藏被改建成經學院。來自布哈拉的伊本·西

107 里昂斯：《書的歷史》，頁48。絲綢之路後期的設拉子，以出產精美的手稿而著稱，參看 Elaine Wright, *The Look of the Book: Manuscript Production in Shiraz, 1303–1452*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Dublin, Ireland: Chester Beatty Library, 2012).

108 勒納：《圖書館的故事》，頁85。

109 納忠著：《阿拉伯通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下冊，頁239。《埃及志》又稱《馬格里基志》，法譯本參看 Ahmad Ibn 'Alī Maqrīzī, Urbain Bouriant and Paul Casanova, *Description Topographique Et Historique De L'Égypte* (Paris: E. Leroux, 1895).

110 楊威理：《西方圖書館史》，頁49。Gilliot, *Education and Learning in the Early Islamic World*, 315.

納（Ibn Sina，又名阿維森納，980–1037年）在他所著的《東方的邏輯》（阿：Mantiq al-Mashriqīyin，英：Logic of the Eastern）之中影射了希臘之外的知識來源，他指的應該是印度哲學，作為穆斯林世界首屈一指的學者，他還參考過布哈拉圖書館中的佛教典籍。<sup>111</sup> 由此可見，到了布哈拉和撒馬爾罕地區，西方的圖書館終於和佛教的經藏文化相遇。總之，中亞的伊斯蘭圖書館數量眾多，加茲尼（Ghazni，今屬阿富汗加茲尼省）等穆斯林王國的首府也照例興建了大型圖書館；蘇菲派的修道堂（波：khanegahs）也設有專門圖書館；什葉派也保持了建立伊瑪目（Imam）圖書館的習俗；因為本文的討論時限大多在十世紀之前，這裡就不逐一細述了。<sup>112</sup>

## 餘論

至此我們已經追溯了宗教圖書館在絲綢之路西段的發展簡史。鑑於黎凡特和中央歐亞的研究門檻過高，即使在「一帶一路」成為顯學的今天，也鮮有學人將絲綢之路和古代圖書館放在一起考察，更遑論宗教圖書館這一冷門課題，故此筆者只能不揣淺陋，以這篇初步的研究來管中窺豹。本文作為筆者研究絲路佛教寫本圖書館的副產品，其目的也是為了探尋西方宗教圖書館對於佛教經藏的潛在影響。因此本文只是奠定了研究的基礎，對於東西絲綢之路上宗教圖書館的異同，筆者將另闢專文加以闡述。

絲綢之路並不是一條暢通無阻的大道，由於帝國的阻隔，絲路的文化交流常常被迫分段進行。儘管如此，貿易、宗教和圖書依然沿着商道的幹線和支線流通，將各大古典文明連綴成互動的文化之

111 Mostafa, *Buddhism in Iran*, 163。伊本·西納在他未完成的簡短自傳中也提到他在布哈拉圖書館中學習的經歷，參看 Avicenna and Farhang Zabeeh, *Avicenna's Treatise on Logic*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1), 6。

112 哈全安：《哈里發國家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頁166。此外，北非的的黎波里（Tripoli）和安達盧西亞的科爾多瓦（Cordoba in Andalusia）等城市都以大型的清真寺圖書館而聞名，但是由於它們位於絲綢之路的地理境域之外，故此不在本文的討論之列。



網。喜愛紙莎草紙的羅馬博物學者普林尼（Pliny the Elder，23–70年）說得好：「若無書籍，文明必死，短命如人生。」<sup>113</sup>

很多證據表明，以希臘—羅馬為代表的圖書館文化成為西方文明的載體，對西亞和中亞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比如，享譽地中海的亞歷山大圖書館成為小亞細亞和波斯圖書館標杆，激發了各路好古君主超越前賢的雄心。同樣，塞琉古王朝（Seleucid Dynasty，前312–前63年）在歐亞大陸建立了30餘座希臘化城市，西方圖書館的蹤跡也由此遠達今日阿富汗的阿伊·哈努姆。文本的交流豐富了圖書館的收藏，不僅是基督徒來到東方試圖融合佛教的觀點，印度學者也帶着梵文寫本到訪中東，受到波斯和希臘雙重影響的伊斯蘭圖書館也在積極地尋訪東方的手稿。隨着地中海和西亞的圖書流傳到遙遠的中亞和北天竺，文化借鑑的趨勢在布哈拉、大夏、犍馱羅（Gandhara）、乃至漢唐西域都有跡可循。近年來，已經有學者從「書籍之路」的視角來看待連接中亞和東亞的絲綢之路。以中亞和西域的絲路佛教為背景，順着這種思路，本文揭示的一些文化碰撞圖景也會出現在後繼有關佛教圖書館史的研究之中。

113 皮納（Pinner）著，康慨譯：《古典時期的圖書世界》（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40。

## 引用書目

- A. A. 瓦西列夫 (A.A.Vasiliev) 著，徐家玲譯：《拜占庭帝國史》。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 年。
- 艾哈邁德·愛敏 (Ahmad Amin) 著，納忠譯：《阿拉伯伊斯蘭文化  
史》第 5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年。
- Afshar, Iraj. “Libraries and Librarianship.” In *A History of Persian  
Literature. Vol. 1: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ersian Literature*.  
Edited by Bruijn and Ehsan Yarshater, 447–74. London: I. B.  
Tauris, 2009.
- Al-Ka’bi, Nasir. *A Short Chronicle on the End of the Sasanian Empire  
and Early Islam*. Piscataway: Gorgias Press, LLC, 2016.
- Al-Nadīm, Muhammad ibn Ishāq, and Bayard Dodge. *The Fihrist of  
Al-Nadīm; a Tenth-Century Survey of Muslim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 Atiyeh, George N. *The Book in the Islamic World: The Written Word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Library of Congress, 1995.
- Avicenna, and Farhang Zabeeh. *Avicenna’s Treatise on Logic*. The  
Hague: Nijhoff, 1971.
- 保羅·卡特利奇 (Paul Cartledge) 著，曾德華譯：《亞歷山大大帝  
——尋找新的歷史》。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0 年。
- Baader, Fritz Henning, and H. J. Grieser. *Codex Sinaiticus Als  
Grundtextausgabe Der Geschriebenen Des Neuen Bundes*.  
Schömberg: F.H. Baader: H.-J. Grieser, 1993.
- Beard, Mary, John A. North, and S. R. F. Price. *Religions of Rome. vol. 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彼得·弗蘭科潘 (Peter Frankopan) 著，邵旭東、孫芳譯：《絲綢之  
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 年。

- Bloom, Jonathan. *Paper before Print: The History and Impact of Paper in the Islamic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Blume, Fred H., and Bruce W. Frier. *The Codex of Justinian: A New Annotated Translation with Parallel Latin and Greek Tex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Bryer, Anthony, and Mary Cunningham. *Mount Athos and Byzantine Monasticism: Papers from the Twenty-Eighth Spring Symposium of Byzantine Studies, Birmingham, March 1994*. Aldershot, Great Britain; Brookfield, Vt., USA: Variorum, 1996.
- Burkard, Günter. “Bibliotheken im alten Ägypten: Überlegungen zur methodik ihres nachweises und übersicht zum stand der forschung.” *Bibliothek: Forschung und Praxis* 4/2 (1980): 79–115.
- Canfora, Luciano. *The Vanished Library: A Wonder of the Ancient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 : *La bibliothèque d’Alexandrie et l’histoire des textes*. Liège: CEDOPAL, 1992.
- Carr, David McLain. *The Formation of the Hebrew Bible: A New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Cassiodorus and P. G. Walsh. *Cassiodorus, Explanation of the Psalms*. Westminster: Newman Press, 1990–1991.
- 查理斯·辛格 (Chales Singer) 主編，潛偉主譯：《技術史 (第 2 卷) ——地中海文明至中世紀 (約前 700 年至約前 1500 年)》。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 年。
- 查理斯·弗裡曼 (Charles Freeman) 著，李大維、劉亮譯：《埃及、希臘與羅馬》。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0 年。
- 陳大川：〈恒羅斯之戰與撒馬爾罕紙〉。收入《中國造紙學會第十二屆學術年會》2005 年，頁 22–32。
- Crawford, Sidnie. *The Dead Sea Scrolls at Qumran and the Concept of a Library*.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5.
- Duft, Johannes. *The Abbey Library of Saint Gall*. St. Gallen: Verlag am

- Klosterhof, 1990.
- 杜環著，張一純箋注：《經行記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Eche, Youssef. *Les bibliothèques arabes publiques et semi-publiques en Mésopotamie, en Syrie et en Egypte au Moyen-Age*. Damas: Institut français de Damas, 1967.
- Edwards, Edward. *Libraries and Founders of Libra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Emerson, Mary. *Greek Sanctuaries and Temple Architecture*.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8.
- Evans, Richard. *A History of Pergamum Beyond Hellenistic Kingship*.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4.
- 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著，唐家龍等譯：《菲力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
- 弗雷德里克·凱尼恩（Frederic Kenyon）著，蘇傑譯：《古希臘羅馬的圖書與讀者》。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
- 弗雷德·勒納（Fred Lerner）著，沈英、馬幸譯：《圖書館的故事——從文字初創到電腦時代》。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4年。
- Fonkitch, B.L. “La bibliothèque de la grande Lavra du Mont-Athos aux Xe-XIIIe siècles.” *Palestinskij Sbornik* 80 (1967): 167–75.
- Ganeri, Anita, and Paola Ravaglia. *The Atlas of World Religions*. Columbus, OH: P. Bedrick Books, 2002.
- Gardner, Iain., and Macquarie University, eds. *From Palmyra to Zayton: Epigraphy and Iconography*. Turnhout, Belgium: Brepols, 2005.
- Gilliot, Claude, ed. *Education and Learning in the Early Islamic World*. Farnham, Surrey, Engl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Variorum, 2012.
- Grafton, Anthony, and Megan Hale Williams. *Christiani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ook: Origen, Eusebius, and the Library of*

- Caesarea*.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Gutas, Dimitri. *Greek Thought, Arabic Culture: The Graeco-Arabic Translation Movement in Baghdad and Early Abbāsīd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 郭丹彤：《埃及與東地中海世界的交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
- 顧明遠主編：《教育大辭典》第11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
- 桂寶麗：《可薩突厥》。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3年。
- 哈全安：《哈里發國家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
- Haikal, Fayza. “Private Collections and Temple Libraries in Ancient Egypt.” In *What Happened to the Ancient Library of Alexandria?*. Edited by Mostafa El-Abbadi and Omnia Fathallah, 39–55. Leiden; Boston: Brill, 2008.
- Harris, Michael H. *History of Libraries in the Western World*. Metuchen, N.J.: Scarecrow Press, 1999.
- Herzfeld, Ernst. “Einige Bücherschätze in Persien.” *Ephemerides Orientales*, no. 28 (1926): 1–8.
- Houston, George. *Inside Roman Libraries: Book Collections and Their Management in Antiquity*.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4.
- 黃坤坊：〈古代亞述的尼尼微檔案圖書館〉。《檔案時空》1993年第4期，頁35。
- 胡爾達茲比赫（Ibn Khordādhbeh）著，宋峴譯：《道里邦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 Jasnow, Richard, and Karl-Theodor Zauzich. *The Ancient Egyptian Book of Thoth: A Demotic Discourse on Knowledge and Pendant to the Classical Hermetica*.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5.

- 金壽福譯注：《古埃及亡靈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
- Johnson, Richard. “Ancient and Medieval Accounts of the ‘Invention’ of Parchment.” *California Studies in Classical Antiquity* 3 (1970): 115–22.
- Johnston, William M., *Encyclopedia of Monasticism*. London: Fitzroy Dearborn, 2000.
- Johnstone, S. “A New History of Libraries and Books in the Hellenistic Period.” *Classical Antiquity* 33, no. 2 (2014): 347–93.
- Kazhdan, Alexander, and Robert Browning. “Library,” In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vol. 2. Edited by Alexander Kazhdan, 1224–2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Krätli, Graziano, and Ghislaine Lydon. *The Trans-Saharan Book Trade: Manuscript Culture, Arabic Literacy,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Muslim Africa*. Boston: Brill, 2011.
- Larsen, Timothy. “Austen Henry Layard’s Nineveh: The Bible and Archaeology in Victorian Britain.” *Journal of Religious History* vol.33, no.1 (2009): 66–81.
- 萊斯莉·阿德金斯 (Lesley Adkins)、羅伊·阿德金斯 (Roy Adkins) 著，張楠譯：《古代羅馬社會生活》。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
- Lawrence, Richardson. *Pompeii: An Architectural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 雷諾茲 (L. D. Reynolds)、威爾遜 (N. G. Wilson) 著，蘇傑譯：《抄工與學者——希臘、拉丁文獻傳播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 Lerner, Frederick Andrew. *The Story of Libraries: From the Invention of Writing to the Computer Age*. New York: Continuum, 1998.
- 理查德·弗羅因德 (Richard A. Freund) 著，屈伯文、方舟譯：《跟著聖經去考古》。上海：上海三聯出版社，2017年。
- 李尚霖：《伊斯蘭的世界地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4年。

- 林梅村：《絲綢之路考古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 林主榮（Timothy H. Lim）著，傅有德、唐茂琴譯：《死海古卷概說》。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年。
- 羅賓遜（James M. Robinson）、史密斯（Richard Smith）編，楊克勤譯：《靈知派經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
- 羅伯特·埃蒂納（Robert Etienne）著，王振孫譯：《龐培——掩埋在地下的榮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
- 羅新：〈撒馬爾罕紙〉。《讀書》2020年第3期，頁152-61。
- MacLeod, Roy. *The Library of Alexandria: Centre of Learning in the Ancient World*. New York: I. B. Tauris, 2004.
- 馬丁·里昂斯（Martyn Lyons）著，龔橙譯：《書的歷史——西方視野下文化載體的演化與變遷》。北京：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2017年。
- 馬家偉、楊曉莉、姜洋主編：《圖書館與圖書館學概論》。長春：吉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6年。
- MacQuitty, William, and Betty MacQuitty. *Island of Isis: Philae, Temple of the Nile*. New York: Scribner, 1976.
- Malleson, George Bruce. *Herat: The Granary and Garden of Central Asia*. London: W. H. Allen & Co, 1880.
- Manchester, Karen, and James B. Cuno. *The Silk Road and Beyond: Travel, Trade, and Transformation*. Chicago: New Haven: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Marzolph, Ulrich. *The Arabian Night: An Encyclopedia*. Santa Barbara: ABC-CLIO, 2004.
- 松田壽男（Matsuda Hisao）著，金曉宇譯：《絲綢之路紀行》。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8年。
- Matthiae, Paolo. *Ebla: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 Meyer, Marvin. *The Gnostic Discoveries: The Impact of the Nag Hammadi Librar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5.

- 蜜雪兒·普契卡 (Michaela Puzicha) 著，杜海龍譯：《本篤會規評注》上下冊。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5 年。
- Moosa, Ebrahim. "Madrasa." In *Encyclopedia of Islam and the Muslim World*, 2nd ed., vol. 2. Edited by Richard C. Martin, 671–76. New York: Macmillan Reference, 2016.
- 納訓譯：《一千零一夜（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 年。
- 納忠著：《阿拉伯通史》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 小野泰博 (Ono Yasuhiro) 著，闕法箴、陳秉才譯：《圖書和圖書館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 年。
- 歐姆斯特德 (Olmsted) 著，李鐵匠、顧國梅譯：《波斯帝國史》。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0 年。
- Pedersen, Johannes, and Robert Hillenbrand. *The Arabic Boo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 皮納 (Pinner) 著，康慨譯：《古典時期的圖書世界》。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 年。
- 普魯塔克 (Plutarch) 著，席代岳譯：《希臘羅馬名人傳》。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9 年。
- 喬納森·萊昂斯 (Jonathan Lyons) 著，劉榜離、李潔、楊宏譯：《智慧宮——阿拉伯人如何改變了西方文明》。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年。
- 饒宗頤：《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中外關係史》第 10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 Rante, Rocco. *Greater Khorasan: History, Geography, Archaeology and Material Cultur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15.
- Rapin, Claude. "Les textes littéraires grecs de la trésorerie d'A Khanoum." *Bulletin de Correspondance Hellenique* 111(1987): 259–65.
- Roazen, Daniel Heller. "Tradition's Destruction: On the Library of Alexandria," *October* 100, no.1 (2002): 133–53.
- Robinson, James M., and Institute for Antiquity and Christianity. *The*



- Coptic Gnostic Library: A Complete Edition of the Nag Hammadi Codices*. vol.5,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 2000.
- . *The Story of the Bodmer Papyri From the First Monastery's Library in Upper Egypt to Geneva and Dublin*. Cambridge: James Clarke, 2011.
- Rosenthal, Franz. *Knowledge Triumphant: The Concept of Knowledge in Medieval Islam*.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 1970.
- 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 Rutherford, Ian. *Greco-Egyptian Interactio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Culture, 500 BC–AD 30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 撒母耳·芬納（Samuel Finer）著，王震譯：《統治史（卷二）——中世紀的帝國統治和代議制的興起——從拜占庭到威尼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
- Scrivener, Frederick Henry Ambrose. *A Full Collation of the Codex Sinaiticus with the Received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Cambridge, London: Deighton, Bell Bell and Daldy, 1864.
- Sibai, Mohamed Makki. *Mosque Libraries: An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New York: Mansell, 1987.
- 斯圖亞特·A. P. 默里（Stuart A. P. Murray）著，胡焯譯：《圖書館——不落幕的智慧盛宴》。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2年。
- Smith, William, and Samuel Cheetham. *A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Antiquities*. vols.2, Hartford: The J. B. Burr Publishing Company, 1875–1880.
- Staikos, Konstantinos. *The History of the Librar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vols. 3–4. Athens: Oak Knoll Press, 2004.
- 史靜寰、李淑華主編：《外國教育思想通史》第三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
- Tabarī, and Franz Rosenthal. *General Introduction and from the Creation to the Flood. The History of Al-Ṭabarī*. vol. 1.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 of New York Press, 1988.
- Thiem, Jon. "The Great Library of Alexandria Burnt: Towards the History of a Symbo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0, no. 4 (1979): 507–26.
- Vaziri, Mostafa. *Buddhism in Iran: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Traces and Influenc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 Veltri, Giuseppe. *Libraries, Translations, and 'Canonic' Texts: The Septuagint, Aquila and Ben Sira in the Jewish and Christian Traditions*.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6.
- Vleeschauwer, Herman. *History of the Western Library*. Pretoria: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1963.
- Vosté, Jacques. *Catalogue de la bibliothèque syro-chaldéenne du Couvent de Notre-Dame des semences près d'Alqoš (Iraq)*. Rome: Bureau de l'Angelicum, 1929.
- 王凱：《西歐中世紀修道院教育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12年。
- 王媛媛：《從波斯到中國——摩尼教在中亞和中國的傳播》。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Wellisch, Hans H. "Ebla: The World's Oldest Library." *The Journal of Library History* (1974–1987) vol.16, no.3 (1981): 488–500.
- Wendel, Carl. *Kleine Schriften Zum Antiken Buch-Und Bibliothekswesen*. Koln: Greven, 1974.
- 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威特基（Anne-Maria Wittke）、奧爾斯豪森（Eckart Olshausen）、希德拉克（Richard Szydlak）主編，葛會鵬、古原馳、史湘潔等譯：《古代世界歷史地圖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
- Wiegand, Wayne A., and Donald G. Davis.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History*. New York: Garland Pub, 1994.
- Wilson, Nigel. "The Libraries of the Byzantine World." *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vol.8, (1967): 53–80.

沃爾班克 (F. W. Walbank) 著，陳恒、茹倩譯：《希臘化世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Wright, Elaine. *The Look of the Book: Manuscript Production in Shiraz, 1303–1452*.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Dublin, Ireland: Chester Beatty Library, 2012.

希羅多德 (Herodotus) 著，王以鑄譯：《歷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年。

辛加爾 (Singhal) 著，莊萬友譯：《印度與世界文明》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年。

希歐多爾·加斯特 (Theodore Gaster) 著，王神萌譯：《死海古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年。

西蒙·普萊斯 (Simon Price) 著，刑穎譯：《古希臘人的宗教生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

楊威理：《西方圖書館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年。

伊本·馬哲 (Ibn Mājah) 輯錄，穆薩·余崇仁譯：《伊本·馬哲聖訓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 年。

佚名著，王治來譯：《世界境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雍際春：《絲綢之路歷史沿革》。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 年。

約翰·桑茲 (John Sandys) 著，張治譯：《西方古典學術史》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

約翰·威利斯·克拉克 (John Willis Clark) 著，楊傳緯譯：《照管圖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 年。

于殿利：《人性的啟蒙時代——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藝術與思想》。北京：故宮出版社，2016 年。

詹姆斯·坎貝爾 (James Campbell) 著，萬木春、張俊譯：《圖書館建築的歷史》。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 年。

詹森 (Elmer D. Johnson) 著，尹定國譯：《西洋圖書館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 年。

張鴻年：《波斯文學史》。北京：昆侖出版社，2004 年。

- 張詠梅：〈中亞猶太人與絲綢之路〉。《文博》1997年第4期，頁45–47。
- 趙汝清：《從亞洲腹地到歐洲——絲路西段歷史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
- 中華文化通志編委會編：《中國與西亞非洲文化交流志》。收入《中華文化通志》，第95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 Zanous, Hamidreza Pasha., and Juping Yang. “Arsacid Cities in the Hanshu and Houhanshu.” *Iran & the Caucasus* vol.22, no. 2 (2018): 123–38.
- Zuckerman, Constantin. “On the Date of the Khazars’ Conversion to Judaism and the Chronology of the Kings of the Rus Oleg and Igor. A Study of the Anonymous Khazar Letter from the Genizah of Cairo.” *Revue des Etudes Byzantines* vol.53 (1995): 237–70.

# From Rome to Persia: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Religious Libraries along the Western Silk Road

WANG Xia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United International College (UIC)

Religious libraries along the Western Silk Road is a multidisciplinary and cross-regional subject of research largely ignored by the Chinese academia. To address the inadequacy, this essay will investigate the early polytheistic temple libraries together with bibliothecae of major religions in certain Silk Road regions traversing Mesopotamia, Egypt, Asia Minor as well as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and West Asia. Resear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ibrary history, classical civilization and world religions, the present study explores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religions and libraries on the Silk Road from the Greco-Roman Levant to Islamic Persia.

**Keywords:** Religious library, Silk Road, library history

